

## 「明清之際」視域下杜詩學的一個側影 ——從「前惟山谷後錢盧」談起\*

李欣錫\*\*

### 摘要

「前惟山谷後錢盧」乃王士禛〈戲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三十二首〉其五對「杜家箋傳」脈絡和典範注家重新界定的開創性說法，透過王詩所展露「明清之際」的觀看視野，吾人可挖掘清初杜詩學的內在意蘊。本文將描述「無意於文」到「哀時託興」兩種杜詩解釋途徑和其視角轉換的軌跡；首先，突出元好問的杜詩學觀點為中介；其次，分別剖析盧世澹、錢謙益箋注立場和目的，置諸易代時空、世變場景中，詳密推求；進由詩壇「錢王代興」現象，捕捉、描繪漁洋「論詩」所展望的杜詩學景觀，察覺其深刻文理下，與當時「明遺民性詩學」話語系統間的關係。由是，本文具杜詩學和明清詩學上的雙重意義和研究價值。

關鍵詞：明清之際、杜詩學、錢謙益、盧世澹、王士禛、元好問

---

\* 本文為科技部研究計畫：「由錢謙益詩作之暗碼系統、意義脈絡論其注杜的特點與成就（II、III）」（NSC 101-2410-H-007-049-MY2）研究成果。本文初稿承蒙匿名審查人惠賜修改意見，謹致謝忱。

\*\* 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 一、前言

當杜詩學「轉型」的明清之際，<sup>1</sup>「錢朱注杜」爭議及所引發廣大迴響，最吸引研究者目光。<sup>2</sup> 同時，錢謙益（1582-1664），字受之，號牧齋，以文章鉅公、清流領袖之位望，躊躇出處抉擇、深陷認同困境，複雜心曲，使聚焦《錢注杜詩》的討論寢入精微；由是，其身影日益高大，於杜詩學重要性也愈加凸顯。

王士禛（1634-1711），字貽上，號阮亭，別號漁洋山人，人稱王漁洋，甚早為牧齋鼓吹，〈戲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三十二首〉其五云：「杜家箋傳太紛拏，虞趙諸賢盡守株。苦為南華求向郭，前惟山谷後錢廬。」<sup>3</sup> 詩為〔清〕康熙二年（1663）作，<sup>4</sup> 時牧齋纏綿病榻，隔年五月廿四日（1664年6月17日）歿；《錢注杜詩》未刻印，漁洋已視牧齋為箋杜典範。王詩引出問題不少，若不細究支節，<sup>5</sup> 止取「山谷」→「錢、廬」移轉過程考察，便有亟需挖掘、疏通之處。本文研究動機，緣是而發生。

<sup>1</sup> 張伯偉，〈杜詩研究與當代學術〉，《江淮論壇》2012年第6期，頁148。許總則以金、元為過渡。許總，〈杜詩學大勢鳥瞰（引論）〉，《杜詩學發微》（南京：南京出版社，1989年），頁2。

<sup>2</sup> 簡恩定，《清初杜詩學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頁123-183；莫礪鋒，〈朱鶴齡杜詩輯注平議〉，《古典詩學的文化觀照》（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頁242-279。參洪業著，曾祥波譯，〈杜詩引得序〉，《杜甫：中國最偉大的詩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頁307-333；柳作梅，〈朱鶴齡與錢謙益之交誼及注杜之爭〉，《東海學報》第10卷第1期（1969年1月），頁47-58。

<sup>3</sup> 〔清〕王士禛著，李毓芙、牟通、李茂肅整理，〈戲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三十二首〉，《漁洋精華錄集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冊上，卷2，頁328。

<sup>4</sup> 張健，〈前言〉，《王士禛論詩絕句三十二首箋證》（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頁1-2；蔣寅，〈王漁洋事跡徵略〉（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頁100。

<sup>5</sup> 如「趙」究誰屬；須再商量。張健，〈王士禛論詩絕句三十二首箋證〉，頁63-64；李建福，〈漁洋論詩絕句證析（一）〉，《文史學報》第17期（1987年3月），頁26。

該究問之議題，李建福、簡恩定（1955-2011）嘗反覆辯難；<sup>6</sup> 今更延伸視角，置諸明清之際背景、清初詩學脈絡中，擘析杜詩學內在文理，期勾勒出歷史的輪廓，展露時代鐫刻的印記。

首先，「山谷」的提出耐人尋味：其注杜與否向難定論，<sup>7</sup> 王氏盍獨鍾之？當深入追究。其次，「錢」指牧齋，〔明〕崇禎時撰《讀杜小箋》、《讀杜二箋》；<sup>8</sup> 經〔清〕順、康際與朱鶴齡（1606-1683）《杜工部詩集輯注》糾紛，修訂中《錢注》名噪一時；漁洋雖未之見，但對牧齋重啟「注杜」卻瞭若指掌。<sup>9</sup> 「盧」指盧世淮（1588-1653），字德水，著《杜詩胥鈔》十五卷、《餘論》一卷，復摘《杜詩胥鈔》中〈大凡〉并《餘論》合刻《讀杜私言》；<sup>10</sup> 近世，黃節（1873-1935）謂《讀

<sup>6</sup> 李建福，〈漁洋論詩絕句證析（二）〉，《文史學報》第18期（1988年3月），頁23-32；簡恩定，〈漁洋論詩絕句「苦為南華尋向郭，前惟山谷後錢盧」正解〉，《文史學報》第18期（1988年3月），頁13-21；李建福，〈再論漁洋〈論詩絕句〉「苦為《南華》求向郭，前惟山谷後錢盧」——兼答簡恩定先生〉，《文史學報》第19期（1989年3月），頁73-92。

<sup>7</sup> 贊同者如曹樹銘，〈《杜詩箋》增校〉，《杜集叢校》（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78年），頁33-104；蔡振念，《杜詩唐宋接受史》（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2年），頁316。

<sup>8</sup> 以上引書，分見〔清〕錢謙益，《讀杜小箋》，《初學集》，收入〔清〕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錢牧齋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冊3，卷106-108，頁2153-2186；〔清〕錢謙益，《讀杜二箋》，《初學集》，冊3，卷109-110，頁2187-2219。本文引錢謙益著作所據版本：《錢牧齋全集》，壹至參冊為《牧齋初學集》，肆至陸冊為《牧齋有學集》，柒至捌冊為《牧齋雜著》及附錄，以下簡稱《初學集》、《有學集》；〔唐〕杜甫著，〔清〕錢謙益箋注，《錢注杜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以下簡稱《錢注》。

<sup>9</sup> 見〔清〕王士禎著，李毓芙、牟通、李茂肅整理，〈戲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三十二首〉，《漁洋精華錄集釋》，冊上，卷2，頁328。又，康熙元年（1662）牧齋曾復書漁洋，知漁洋曾詢問注杜事。見〔清〕錢謙益，〈與王貽上〉，《錢牧齋先生尺牘》，《牧齋雜著》，收入〔清〕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錢牧齋全集》，冊7，卷1，頁224。

<sup>10</sup> 以上引書，分見〔唐〕杜甫撰，〔清〕盧世淮選述，《杜詩胥鈔》（劍橋：哈佛燕京圖書館，2007年，據明崇禎七年〔1634〕盧氏尊水園刊本縮製微捲）；〔清〕盧世淮，《讀杜私言》，《尊水園集畧》，《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據清順治刻十七年〔1660〕盧孝餘增修本影印），冊1392，卷6，頁423-449；〔清〕盧世淮，《讀杜私言》，見王學泰編纂，《盧世淮詩話》，收入吳文治主編，《明詩話全編》（南京：鳳凰出版社，1997年），冊9，頁9099-9133。

杜私言》「貫穿一意，……以窺全體」，始為申張灼見。<sup>11</sup>

質言之，漁洋以「錢、盧」同列，立論基礎並不堅實。本文由王詩發端，頗依託「錢王代興」說，<sup>12</sup> 欲洞察新一代詩壇中堅，如何看待「杜詩箋傳」傳統？如何標舉典範注家，指認其成就？此意味，逼見漁洋所呈示「明清之際」論杜視野之面貌框架，將是搜討的重心。與茲相關，隱伏「戲仿元遺山論詩」題下，當代評鶯標準、旨趣為何？漁洋如何連繫「山谷」、「錢、盧」？僦居易代時空之「明遺民性詩學」<sup>13</sup> 聲口，是否仍介入詩的場域？諸多提問，筆者當盡力發覆。

## 二、「無意於文」與「哀時託興」 ——認識杜詩的兩種方式

「山谷」、「錢、盧」之論杜意見有別，其所映現，乃宋代以還認識杜詩的兩種方式：自「無意於文」至「哀時託興」的變化軌跡；此二端經王詩綰合，標識出明末清初杜詩學複雜、深刻的內涵。

<sup>11</sup> 廖仲安，〈讀詩瑣掇·黃節所作盧世淮《讀杜私言》序〉，《反芻集》（北京：北京師範學院出版社，1986年），頁514。

<sup>12</sup> 學界近年未必循繼承角度談二人詩學關係。參裴世俊，〈清初錢、王「代興」之說芻議〉，《山東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89年第3期，頁54-60；蔣寅，〈王漁洋與康熙詩壇〉（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頁1-25；嚴志雄，〈秋柳的世界：王士禛與清初詩壇側議〉（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13年）；嚴志雄，〈清初錢謙益王士禛「代興」說再議〉，收入山東省古典文學學會、王漁洋文化研究保護中心編，《紀念王漁洋誕辰380周年全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濟南：齊魯書社，2016年），頁29-47。

<sup>13</sup> 「明遺民性詩學」（Poetics of Ming loyalism）或「明遺民體詩」（Ming loyalist poetics）說法為嚴志雄先生提出，本文為行文方便，有時逕稱為「遺民性」。見Lawrence C. H. Yim, *The Poet-historian Qian Qianyi*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1-11；嚴志雄，〈錢謙益的「詩史」理論與實踐〉（北京：中華書局，2019年），頁1-19。

### (一) 山谷《杜詩箋》見疑於後代

元末陶宗儀(1329-1410)《說郛》、明嘉靖刻《黃先生全書》皆收錄黃庭堅(1045-1105)《杜詩箋》，都六十則。<sup>14</sup> 惟黃氏，字魯直，號山谷道人，亦作〈大雅堂記〉：

余嘗欲隨欣然會意處，箋以數語，終以汨沒世俗，初不暇給。雖然，子美詩妙處乃在無意於文，夫無意而意已至，非廣之以《國風》《雅》《頌》，深之以《離騷》《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闖然入其門耶！……彼喜穿鑿者，棄其大旨，……以為物物皆有所托，如世間商度隱語者，則子美之詩委地矣。<sup>15</sup>

啣惜未竟全功；於是爭議蠱起。<sup>16</sup>

從版本淵源論，原《豫章黃先生別集·杜詩箋》頗遭「後人掇拾」非議。<sup>17</sup> 然元好問(1190-1257)，號遺山，其〈杜詩學引〉曰：

杜詩注，六七十家，……鑿空架虛，旁引曲證，鱗雜米鹽，反為蕪累者亦多矣。……但未知九方皋之相馬，得天機於滅沒存亡之間，物色牝牡，人所共知者為可略耳。先東巖君有言：近世唯山谷最知子美，以為今人讀杜詩，至謂草木蟲魚皆有比興，……此最學者之病。山谷之不注杜詩，試取〈大雅堂記〉

<sup>14</sup> [宋]黃庭堅著，鄭永曉整理，《杜詩箋》，《黃庭堅全集輯校編年》(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冊下，頁1621-1626；[宋]黃庭堅，《杜詩箋》，收入[元]陶宗儀編，《說郛》，《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冊880，卷79下，頁421-425。

<sup>15</sup> [宋]黃庭堅著，鄭永曉整理，〈大雅堂記〉，《黃庭堅全集輯校編年》，冊中，頁927。

<sup>16</sup> 見曹樹銘，〈《杜詩箋》增校〉，《杜集叢校》，頁33-104；程千帆，〈杜詩偽書考〉，《古詩考索·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334-336；[唐]杜甫撰，[宋]黃庭堅箋，《杜詩箋一卷》，收入周采泉編，《杜集書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內編，卷8，頁447。

<sup>17</sup> [宋]黃庭堅著，鄭永曉整理，〈前言〉，《黃庭堅全集輯校編年》，冊上，頁1-19。

讀之，則知此公注杜詩已竟。可為知者道，難為俗人言也。<sup>18</sup>

仍翻作「注杜詩已竟」新解。至《說郛》雖真偽雜糅；<sup>19</sup> 杜詩吳若（?-?）本注（南宋建康府本）<sup>20</sup> 述校例，及蔡夢弼（?-?）《杜工部草堂詩箋》諸集註本一再引魯直，是皆證前有所承。

若查對《杜詩箋》本文，程千帆、李建福已辨明「偽託」事證，<sup>21</sup> 惟周采泉（1911-1999）謂《黃氏日鈔》全錄其書；今考，凡箋五則，文字小異。以下，據《杜集叢校》編「題號」、「詩題」臚列之：

11、〈偈仄行〉：「請急」，請假也，晉令如此。

38、〈從人覓小胡孫許寄〉：「咳」，苦革反。

40、〈堂成〉：「籠竹」之「籠」，音汞。蜀名大竹為夢籠。

59、〈九日五首〉其一：「竹葉」出張華〈輕薄篇〉，云：「蒼梧竹葉青，宜城九醞酒。」

60、〈戲作俳諧體二首〉其一：峽中養鴉雛，帶銅錫環獻神，名烏鬼。<sup>22</sup>

《黃氏日鈔》為黃震（1213-1281）撰，其生卒、活動年月較晚於吳若、趙次公（?-?）；<sup>23</sup> 此笱記，宜《杜詩箋》最早見錄。筆者考校如下：

<sup>18</sup> [金]元好問著，狄寶心校注，〈杜詩學引〉，《元好問文編年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冊上，卷1，頁91-92。

<sup>19</sup> [清]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冊上，卷123，頁1062。

<sup>20</sup> 參鄧紹基，〈關於錢箋吳若本杜集〉，《江漢論壇》1982年第6期，頁44；陳尚君，〈杜詩早期流傳考〉，《敬畏傳統》（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46-67。

<sup>21</sup> 程千帆，〈杜詩偽書考〉，《古詩考索·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頁323-341；李建福，〈再論漁洋〈論詩絕句〉「苦為《南華》求向郭，前惟山谷後錢盧」——兼答簡恩定先生〉，頁74-75。

<sup>22</sup> [宋]黃震，《黃氏日鈔》，收入張偉、何忠禮主編，《黃震全集》（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3年），冊6，卷65，頁1967。

<sup>23</sup> 參蔡錦芳，〈吳若本與《錢注杜詩》〉，《杜詩版本及作品研究》（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07年），上編，頁73；孫微、王新芳，〈吳若本《杜工部集》研究〉，《圖書情報知識》2010年第3期，頁32-33。趙次公生平，詳[唐]杜甫著，[宋]趙次公注，林繼中輯校，〈前言〉，

其一，〈偈仄行〉箋文類趙注，較《錢注》簡省，錢引「晉令」文字與《說郛》、《豫章黃先生別集》同；趙、錢二本，未明提黃注。<sup>24</sup>考《宋本杜工部集》僅注「贈畢耀」，知「請急」非工部原注；又《錢注》據吳若為底本，凡「認為不是杜甫自注的，大多以『吳若本注』等字樣移至篇後錢箋部分，或徑行刊落。」<sup>25</sup>今覆案之，亦無。此意謂：《黃氏日鈔》前，未見以相近文字為黃注之記載。

其二，〈從人覓小胡孫許寄〉箋文注「咳」，《杜集叢校》謂「宋本（一〇・二四）、郭本（二〇・三三一）及錢本（一〇・三五六）皆作駭，一作共愛」，<sup>26</sup>所言「宋本」，即上海商務印書館 1957 年《宋本杜工部集》，學者共識為二王、吳若泮合本，注文合工部原注、吳若本注、北宋若干名家注語而成。是知：宋人（九家注前）未見「咳」異文，不讀「咳」（苦革反）音，亦不為出注。<sup>27</sup>

其三，〈堂成〉云「大竹」者，除仇兆鰲（1638-1717）注述《杜詩箋》外，惟《錢注》引《益州方物記》近。其四，〈九日五首〉，趙注引張華（232-300）〈輕薄篇〉，再引張協（?-?）〈七命〉，郭、蔡本皆然，惟《錢注》敘次相反。其五，〈戲作俳諧體二首〉，「烏鬼」說總雜，《九家集注杜詩》據杜田（?-?），趙注同；《錢注》引《演繁

---

《杜詩趙次公先後解輯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冊上，頁1-3；陳尚君，〈喜讀《杜詩趙次公先後解輯校》〉，《杜甫研究學刊》1996年第2期，頁70；莫礪鋒，〈評林繼中的《杜詩趙次公先後解輯校》〉，《唐宋詩論稿》（瀋陽：遼海出版社，2001年），頁153-154。

<sup>24</sup> 曹樹銘，〈《杜詩箋》增校〉，《杜集叢校》，頁36。

<sup>25</sup> 謝思煒，〈《宋本杜工部集》注文考辨〉，《唐宋詩學論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頁101。另參〔日〕長谷部剛文，李寅生譯，〈簡論《宋本杜工部集》中的幾個問題——附關於《錢注杜詩》和吳若本〉，《杜甫研究學刊》1999年第4期，頁31-38；郝潤華，〈《錢注杜詩》與詩史互證方法〉（合肥：黃山書社，2000年），頁54-57。

<sup>26</sup> 曹樹銘，〈《杜詩箋》增校〉，《杜集叢校》，頁50。

<sup>27</sup> 黃希（?-1057）、黃鶴（?-?）本作「咳」。

錄》元稹（779-831）詩，當是牧齋補入。<sup>28</sup>

總前述，《黃氏日鈔》難為山谷作證；《杜詩箋》仍不免見疑後代。<sup>29</sup>

## （二）山谷「注杜詩已竟」說及所預示杜詩學的轉身

翁方綱（1733-1818）《石洲詩話》評語，恰反應當代學者對王詩論點的疑慮：

山谷〈大雅堂記〉自是高識，然不能與後人注杜者並論也。盧氏《杜詩胥鈔》，其書不甚行於世，……此蓋漁洋傳會其鄉人之詞，不可為據也。<sup>30</sup>

推譽山谷「高識」，止引〈大雅堂記〉；質難《杜詩胥鈔》粗疏，意漁洋因鄉誼而率許人；指摘的針對性，瞭然可曉。實「山谷」、「錢、盧」出王氏具眼，論者自應通其條貫，朗現漁洋識力縱深；要之，審決標準係對宋代箋注亂象之重省、明末清初「以詩存史」行動的肯定；一偏於杜詩學範疇，一牽涉世變，與鼎革間士人心態相關。

爬梳「杜詩學」脈絡，前述視野，在元好問杜詩批評中，首度碰撞交集；其人遭際升沉，為杜詩解釋滲入「世變」運會的關懷，重揭出老杜直視板蕩流離之目光；是即發明王詩隱奧的關鍵。

遺山潛心杜詩，發源甚早，〔金〕宣宗興定元年（1217）作〈論詩三十首〉，其十曰：「少陵自有連城壁，爭奈微之識珉玦。」<sup>31</sup> 拒元稹

<sup>28</sup> 郝潤華等，《杜詩學與杜詩文獻》（成都：巴蜀書社，2010年），頁135。

<sup>29</sup> 前賢持論多如是，本文精益求精，亦有發覆之處。參張忠綱等編著，《杜集敘錄》（濟南：齊魯書社，2008年），頁25-26。

<sup>30</sup> 〔清〕翁方綱著，陳邇冬校點，《石洲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卷8，頁240-241。

<sup>31</sup> 〔金〕元好問著，狄寶心校注，〈論詩三十首〉，《元好問詩編年校注》（北京：中華書局，

以「排比鋪張」言老杜精髓；〔金〕哀宗正大二年（1225）編纂《杜詩學》，今亡佚，惟存〈杜詩學引〉。據〈杜詩學引〉所述，乃排擊「鑿空」、「蕪累」，倡「得天機於滅没存亡之間」。<sup>32</sup> 在此一提法上，〈大雅堂記〉扮演了重要角色，因元說從山谷舊調翻出，<sup>33</sup> 賸欲擺脫由字句、故實訪求託興末技，直攫出老杜的真精神、真面目；而從〈杜詩學引〉對〈大雅堂記〉原文之轉引和彼此文意脈絡的相互承繼關係，亦可得知元氏批評立場所本，由是，合〈大雅堂記〉、〈杜詩學引〉同勘，調宜含咀「古人之精華」，「髣髴其餘韻」，體貼詩人「無意於文」「妙處」，始見工夫，<sup>34</sup> 換言之，要追躡騷、雅，深厚學養，超越「寄託」層次領略詩歌深意，如此，方能煥發「連城璧」光彩。若從元詩亦具「詩史」之目，及其編《中州集》欲「各成一家之言，備一代之音」尚論風雅的企圖而討源，<sup>35</sup> 則〈論詩三十首〉、〈杜詩學引〉所呼籲，蓋躋登「大雅」之道：會須潛入杜甫（712-770）推擴「一己之悲辛」而成就「一國之心」的表現形式，浸潤其詩化的道德情感，<sup>36</sup> 沉

2011年），冊1，頁54。

<sup>32</sup> 〔金〕元好問著，狄寶心校注，〈杜詩學引〉，《元好問文編年校注》，冊上，卷1，頁91。

<sup>33</sup> 詹杭倫、沈時蓉，《杜詩學管窺》（臺中：文听閣圖書公司，2012年），頁92-94。

<sup>34</sup> 以上引文，分見〔金〕元好問著，狄寶心校注，〈杜詩學引〉，《元好問文編年校注》，冊上，卷1，頁91；〔宋〕黃庭堅著，鄭永曉整理，〈大雅堂記〉，《黃庭堅全集輯校編年》，冊中，頁927。詹杭倫、沈時蓉以為「天機」包含「杜詩創作的『天機』和注詩者善識『天機』」。詹杭倫、沈時蓉，《杜詩學管窺》，頁92；徐國能認為黃庭堅、元好問「主張透過對傳統文化的融會吸納以作為讀杜之根本，並憑藉這一層工力來『得天機』。」見徐國能，〈元好問杜詩學探析〉，《清華中文學報》第7期（2012年6月），頁215-216。

<sup>35</sup> 元好問於金亡後，曾為《中州集》、《中州樂府》等；以國史著作自任者。〔清〕錢謙益，〈題中州集鈔〉，《初學集》，收入〔清〕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錢牧齋全集》，冊3，卷83，頁1757。參趙興勤，《元遺山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2011年），頁225；陶子珍，〈金代詞選——元好問《中州樂府》析論〉，《彰化師大國文學誌》第12期（2006年6月），頁255-281。

<sup>36</sup> 以上論述，分見林繼中，〈杜詩的張力——忠君愛民思想在杜詩中的表現形式〉，《杜詩學論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頁18；林繼中，〈星宿之海：杜詩中的道德情感〉，

吟山谷「千古是非存史筆，百年忠義寄江花。」所看重杜甫之詩史意識、忠義精神，<sup>37</sup> 發掘〈大雅堂記〉強調詩藝又重視倫理的解釋史意義，<sup>38</sup> 庶幾捕逐「天機」。

上述推測，在遺山身上可印證。當〈論詩三十首〉前數年，蒙元屢陷河朔、兵臨中都，〔金〕宣宗貞祐二年（1214）南遷汴京，廿載後（1234）亡國。審遺山生命際遇，循前述理解，切入杜詩宏觀的家國視野、悲憫情懷，實不令人意外；若更縱觀國難前、後創作、著述情感祈向，乃發現與所闡明少陵精神，竟如此熨貼，尤幽蘭一燼後，獨以詩存史，在寒闌劫灰中勉力維持星火，支柱中州文章、氣象於血色侵曉；苦心孤詣，除當得「杜陵嫡派」<sup>39</sup> 描述，無乃躬身踐履了「詩史」自覺，映照出時代的面容。<sup>40</sup> 是知：浮世亂局，遺山未必大節明朗，<sup>41</sup> 卻標異風骨、揚厲清響；結體散文，故能傾動後世。就此點言，與錢謙益有身世暗合、胸次雷同之處。<sup>42</sup>

《杜詩學論叢》，頁 59-64。

<sup>37</sup> 蔡振念，《杜詩唐宋接受史》，頁 291、316。

<sup>38</sup> 謝思焯，〈杜詩解釋史概述〉，《唐宋詩學論集》，頁 83-84；許總，〈要當掣鯨魚 豈但看翡翠——江西詩派杜詩學探微〉，《杜詩學發微》，頁 75-86。

<sup>39</sup> 蕭麗華，《元詩之社會性與藝術性研究》（臺北：國家出版社，1998 年），頁 329-335。另參趙興勤，《元遺山研究》，頁 226；徐國能，〈元好問杜詩學探析〉，頁 193-194。

<sup>40</sup> 參趙興勤，《元遺山研究》，頁 221；程千帆，〈對於金代作家元好問的一、二理解〉，《文史哲》1957 年第 6 期，頁 3249。

<sup>41</sup> 朱東潤著，陳尚君整理，〈整理後記〉，《元好問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年），頁 153。

<sup>42</sup> 陳衍（1856-1937）：「遺山何止勝虞山而已。」見〔清〕陳衍撰，王培軍校點，《石遺室詩話續編》，收入張寅彭主編，《民國詩話叢編》（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 年），冊 1，卷 5，頁 649。錢謙益編定《列朝詩集》即有取於《中州集》甚多，見〔清〕錢謙益，〈與周安期〉，《錢牧齋先生尺牘》，《牧齋雜著》，收入〔清〕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錢牧齋全集》，冊 7，卷 1，頁 236。惟《列朝詩集》不依《中州集》迄於「癸」之例而止於「丁」，更寓有期待明室中興之意。此外，就《有學集》中諸言語，知遺山存史之任、故國之思於牧齋影響甚大。分見〔清〕錢謙益，〈蕉園〉，《有學集》，收入〔清〕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錢牧齋全集》，冊 4，卷 8，頁 387；〈歲晚過茂之見架上殘帙有感再次申字韻〉，《有學集》，冊 4，

總結前論，元氏作詩，不惟意匠襲化老杜，其沛然流露，記錄時事、評價歷史的沉鬱情感、峻切風調，併與《中州集》一類著述，共推動「詩史」新生；<sup>43</sup> 至於論詩、論杜趣向，其熔鑄山谷，<sup>44</sup> 在漁洋建構箋杜譜系過程，出力甚多，殆宋、清兩代箋杜意識、價值命題得賡續、承啟的樞紐。第遺山軌範「大雅」、椎心「喪亂」，顛撲刺促、冰炭滿懷之際，其言山谷「注杜詩已竟」<sup>45</sup> 論見始鑪錘成形；當世積亂離，「風騷」本旨固不厭躑躅章句，勢縱身鼓噪社會現實和歷史脈動，「箋杜」動能亦不滿嚼齧蟲魚，必竭力探尋安頓排遣的情志空間；在國變前夕餘映下，遺山不意打破時代拘限，觸及「詩史」最幽微的本質，與之窅然相契。無形中，浸成杜詩解釋融通詩、史畛域，突破敘事疆界的意見先聲，從而開拓論杜格局，也預示杜詩學的轉身。

質言之，漁洋戲仿遺山〈論詩三十首〉，即預設和元氏詩學觀對話的要求，讀者亦應在「論詩絕句」傳統下貫通針縷；<sup>46</sup> 循遺山論杜本源，終須追問山谷以子美「無意而意已至」<sup>47</sup> 為獨詣的發生原因。

山谷學杜，先關注其思想人品，仰望其「忠義」情懷，進而由老杜作詩「無一字無來處」基礎，提出「奪胎換骨」、「點鐵成金」句法論，霑溉後人；<sup>48</sup> 但這早年形成的詩法特徵，<sup>49</sup> 日後發生極大轉變，

卷 1，頁 41；〈列朝詩集序〉，《有學集》，冊 5，卷 14，頁 678。

<sup>43</sup> 〔元〕郝經，〈陵川集本遺山先生墓銘〉，見〔金〕元好問著，姚奠中主編，《元好問全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冊下，卷 50，頁 432-435。

<sup>44</sup> 李正民，〈元好問詩論初探〉，《西南師範學院學報》1981年第4期，頁 70-82。

<sup>45</sup> 〔金〕元好問著，狄寶心校注，〈杜詩學引〉，《元好問文編年校注》，冊上，卷 1，頁 92。

<sup>46</sup> 周益忠，〈導讀〉，《論詩絕句》（臺北：金楓出版社，1999年），頁 1-41；周益忠，〈元遺山的論詩絕句〉，《論詩絕句》，頁 245-279；蔡英俊，〈論杜甫戲為六絕句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的意義〉，收入周益忠，《論詩絕句》，頁 197-244。

<sup>47</sup> 〔宋〕黃庭堅著，鄭永曉整理，〈大雅堂記〉，《黃庭堅全集輯校編年》，冊中，頁 927。

<sup>48</sup> 莫道才，〈黃庭堅論杜甫〉，《杜甫研究學刊》1997年第2期，頁 53-61。

<sup>49</sup> 趙敏俐、吳思敬主編，韓經太等著，《中國詩歌通史：宋代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年），頁 319。

察黃詩，晚年造平淡質樸，其詩藝成熟與詩論發展歷程適相同步，<sup>50</sup>如并撰於戎州之〈與王觀復書三首〉倡「不煩繩削而自合」、「簡易而大巧出焉」、「無斧鑿痕」，<sup>51</sup>乃「更強調技藝純熟至極，可自然與詩法契合，從心所欲，自然渾成。」<sup>52</sup>體現於詩藝追求，即由對前人辭意模仿，轉向構思方式的借鑒變化，<sup>53</sup>殆上承子美「詩律細」、「渾漫與」，<sup>54</sup>下開遺山「元氣淋漓，隨物賦形」，<sup>55</sup>是皆合「技進於道」之藝術演化過程。<sup>56</sup>但需注意，黃氏評杜甫「平淡而山高水深」，<sup>57</sup>乃推崇其對諸藝術形式經千錘百煉之功，始躍入不煩繩削的境界，此成就，蓋源於對深厚文學素養、天巧偶發靈感、豐富藝術積累之超越；<sup>58</sup>持審〈論作詩文〉：「熟讀三五十遍」、〈答洪駒父書三首〉：「陶冶萬物」說法，<sup>59</sup>山谷要為文者據杜、韓諸「來處」諷誦涵泳，於天地萬物、大化流行中優游盤桓，參悟「古人繩墨」；細繹之，該熟讀、陶冶工夫，正推促了創作、批評的覺醒。惟出此胸臆境界，故山谷能隨心所欲，成就豐富的詩歌樣貌。<sup>60</sup>

<sup>50</sup> 莫礪鋒，〈論黃庭堅詩歌創作的三個階段〉，《文學遺產》1995年第3期，頁70-79。

<sup>51</sup> 〔宋〕黃庭堅著，鄭永曉整理，〈與王觀復書三首〉，《黃庭堅全集輯校編年》，冊中，頁939-940。

<sup>52</sup> 何繼文，〈翁方綱對黃庭堅詩的評價〉，《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2012年第54期，頁239。

<sup>53</sup> 莫礪鋒，〈論黃庭堅詩歌創作的三個階段〉，頁70-79。

<sup>54</sup> 以上引文，分見〔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遺悶戲呈路十九曹長〉，《杜詩詳注》（臺北：里仁書局，1980年），冊3，卷18，頁1602；〈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冊2，卷10，頁810。

<sup>55</sup> 〔金〕元好問著，狄寶心校注，〈杜詩學引〉，《元好問文編年校注》，冊上，卷1，頁91。

<sup>56</sup> 詹杭倫、沈時蓉，《杜詩學管窺》，頁92-94。

<sup>57</sup> 〔宋〕黃庭堅著，鄭永曉整理，〈與王觀復書三首〉，《黃庭堅全集輯校編年》，冊中，頁940。

<sup>58</sup> 莫礪鋒，〈論蘇黃對唐詩的態度〉，《唐宋詩歌論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年），頁379-395；許總，〈要當掣鯨魚 豈但看翡翠——江西詩派杜詩學探微〉，《杜詩學發微》，頁82。

<sup>59</sup> 以上引文，分見〔宋〕黃庭堅著，鄭永曉整理，〈論作詩文〉，《黃庭堅全集輯校編年》，冊下，頁1628；〈答洪駒父書三首〉，冊中，頁733。

<sup>60</sup> 廖美玉，〈東京與兩川——王安石、黃庭堅學杜的兩種視角〉，收入上海社會科學院《傳統中

自「論杜」一端言，其詩藝格法最終追求，和〈大雅堂記〉猶桴鼓相應，以是，山谷得為杜詩妙處下「無意於文」之註腳，為後生輩指示「無意而意已至」悟入「天機」津梁，<sup>61</sup> 尋以「注杜詩已竟」姿態，<sup>62</sup> 靜待一破碎時代，一介蒼涼的詩人，與一篇〈杜詩學引〉現身。

### （三）「不箋一字」風潮中，錢謙益的突圍

徐國能謂：〈杜詩學引〉要讀者追求「領會詩人遙深悟境」；〈大雅堂記〉臻「不注而注」，則標舉「從自我學養的增益中去逐步理解」的讀杜之法。<sup>63</sup> 此論，強調「渾化無跡」境界，揭露在隱、顯之際為詩人心蹤解碼的艱難，<sup>64</sup> 適描繪元氏促「無意於文」說向「哀時託興」解釋傾斜的杜詩學軌跡。文中對遺山推崇趙注之觀察，值得深思，其闡明遺山在意「注家能否真正理解杜詩對傳統文化的汲取和活用」，換言之，即是否如趙氏「能發揮杜甫轉化所學以為詩的特色」。<sup>65</sup> 可為「明清之際」視域下研究參照：（1）前者假設，詩人在豐厚文化基礎上展開創作，透過箋注，有助疏通詩意。此共識，誠清初遺民性寫作對付惘惘威脅時，自然謹守的內規。（2）後者，吾人因知：繁瑣考證和重視典故，無妨「渾化無跡」之追求。

回到〈杜詩學引〉天機／學養問題，發生意義的起點，第在〈大雅堂記〉；由黃、元一貫杜詩學條脈剖析「學養」、探問「天機」，亦必循「風雅」、「忠義」為指向。如此，突出了杜甫「詩歌歷史」視域下

---

國研究集刊》編輯委員會編，《傳統中國研究集刊》第6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頁221。

<sup>61</sup> 〔宋〕黃庭堅著，鄭永曉整理，〈大雅堂記〉，《黃庭堅全集輯校編年》，冊中，頁927。

<sup>62</sup> 〔金〕元好問著，狄寶心校注，〈杜詩學引〉，《元好問文編年校注》，冊上，卷1，頁91-92。

<sup>63</sup> 徐國能，〈元好問杜詩學探析〉，頁189、215。參李正民，〈元好問詩論初探〉，頁77。

<sup>64</sup> 徐國能，〈元好問杜詩學探析〉，頁212-218。

<sup>65</sup> 徐國能，〈元好問杜詩學探析〉，頁213。

的形象，<sup>66</sup> 但不意調消解其社會性，相反地，刻畫現實筆鋒，透過強烈情感體驗、歷史評判意識，展露深摯詩史關懷，為杜詩爭取到寬敞的詮釋空間。嗣後，資此超越視角，漸成明、清杜詩箋釋的特色。

如翁方綱為王士禛後重要詩家，嘗附和王氏，謂山谷脫胎杜甫、又自關一家；<sup>67</sup> 二氏「山谷學杜」意見，遞相共鳴。何繼文〈翁方綱對黃庭堅詩的評價〉提挈翁氏評黃詩「肌理」特色，約言之：基於古人學問，重視倫理性情，發乎溫柔敦厚，關注比興寄託，造極大巧、歸諸平淡。<sup>68</sup> 此數點，汲為疏通王詩思路前理解，是再度明確了「前惟山谷」寓意中天機／學養的根柢所在。<sup>69</sup>

至此，本文獨揭元氏據「國事蝸蟻」契機為杜詩學開疆闢土的意義，強調其「山谷」、「錢、盧」間催化作用。是認：可彌縫漁洋詩意罅漏，俾讀者正視北宋、明清之際兩場箋注杜詩行動，並回望金源、清初兩代詩人接力評述前賢的足跡。遵此視野，結合漁洋「戲仿」所透露追躡、嗣響之積極意欲，「清代論詩詩」一再扣問杜、元，表明繼承關係之寫作意識；<sup>70</sup> 「山谷」→「遺山」→「錢、盧」箋杜脈絡，於王詩中可清晰指認。漁洋以元氏後進之姿，藉將山谷推上「箋釋者」舞臺向前輩（遺山）致敬，順勢提出「欣然」解會「天機」法門；全力迎擊「皆有比興」、「商度隱語」式的注杜流弊。

漁洋反省有其歷史因素。明末清初，學界掃除壅蔽，至出現以「不

<sup>66</sup> 廖美玉，〈東京與兩川——王安石、黃庭堅學杜的兩種視角〉，頁 220。

<sup>67</sup> 鄭永曉，〈關於黃山谷學杜的歷史爭議及重新認識〉，《廣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 年第 8 期，頁 60。

<sup>68</sup> 何繼文，〈翁方綱對黃庭堅詩的評價〉，頁 231-254。

<sup>69</sup> 山谷強調對藝術素養的積聚、創作技巧的鍛煉，皆「與杜甫的創作經驗與精神密不可分」。許總，〈要當掣鯨魚 豈但看翡翠——江西詩派杜詩學探微〉，《杜詩學發微》，頁 97-106。

<sup>70</sup> 如錢謙益〈姚叔祥過明發堂，共論近代詞人，戲作絕句十六首〉其一，以繼承元好問自居；清人論「論詩詩」一體演變，也常在元氏後便舉到王士禛。張伯偉，〈清代論詩詩的新貌〉，《江蘇社會科學》2002 年第 3 期，頁 128-129。

箋一字」追求簡明通達之極端傾向；<sup>71</sup> 革新風潮中，《杜詩笺鈔》、《讀杜私言》手眼不凡，體現注家期待，應即受標舉之因。但實際上，《讀杜小箋》、《讀杜二箋》與《杜詩笺鈔》白文選本作法相背，和《讀杜私言》供隅反旁通之進路懸絕；那麼，「錢、盧」如何共同章顯嶄新的典範訴求呢？本文回到元氏杜詩觀為起點說明：蓋〈杜詩學引〉疵議，以蕪累也！盧氏芟汰一切，雖逕接遺山、有命世之勇，然究積極意義，不若別建構一體貼杜詩方式為善。特此際，天崩地解，牧齋掌握變局中關鍵的創作時刻，取「比興」、寓「史義」，遂跨越詩、史界限，宣告詩中有史的企圖。<sup>72</sup> 此動向，入清後《有學集》、《投筆集》變本加厲，愈凸顯回應「明清之際」脈動和士人寫作需求的努力，同時，這也解釋了「錢、盧」之謎。

鼎革後，漁洋交接遺老，甚知以詩存史行動下，緬想勝國衣冠、接繼文化統緒之堅持。亦察曉：明代因重省「詩史」而形成「比興寄託」追求，不僅根植於詩壇，亦蔓生至注詩、論詩畛域；<sup>73</sup> 入清士人徬徨丘墟，感激忠憤，因獲抒發管道，延續「身陷賊中」的吞聲掩抑。

漁洋〈戲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三十二首〉其九：「《草堂》樂府擅驚奇，杜老哀時託興微。」<sup>74</sup> 即挾上述風勢推出，但「託興」的杜詩如何解釋？首為箋注者難題，所幸，牧齋益打破詩歌、箋注文字樊籬，將「詩涵史義」全面推擴、解放至《錢注》文本內容上，繇是，箋杜無異言志作詩；比興託寄要為箋注方略；時人解會「比興」路徑，遂得移諸「箋傳」適用。更申明之，《錢注》敘事、議論上下馳驟、一片

<sup>71</sup> 孫微、王新芳，〈「不箋一字是功臣」——論明清杜詩學中的一種極端傾向〉，《中國韻文學刊》2007年第4期，頁27-30、44。

<sup>72</sup> 〔清〕錢謙益，〈胡致果詩序〉，《有學集》，收入〔清〕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錢牧齋全集》，冊5，卷18，頁800-802。

<sup>73</sup> 龔鵬程，《詩史本色與妙悟》（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2年），頁64。

<sup>74</sup> 〔清〕王士禛著，李毓芙、牟通、李茂肅整理，〈戲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三十二首〉，《漁洋精華錄集釋》，冊上，卷2，頁332。

神理，是即詩意完足、天機流動；讀《錢注》欲掌握杜老形跡、襟抱，則須解開注、箋中錯置暗碼，含咀文字內紛呈意義；最後，當走入牧齋筆削布置，與杜甫視野交融、對話交鋒的渾涵語境，輒宜提出「詩史」評價。據此，杜詩「哀時託興」成為可能，《錢注》許為推度「微」言之經典文本。<sup>75</sup>

如上述，屢言「興寄」、「解碼」，似未掙脫窠臼；實則不然，《錢注》於系統編織的比興言語後，含藏一明明之眼，以少陵忠忱為起點，溯沿三代盛衰、下瞰百年興替，揭出治亂之幾，歸結歷史上翻覆循環的經驗教訓；與盧氏《讀杜私言》趣尚若合符契。準此，「錢、盧」為「明清之際」箋杜典範，意義寔可成立。

### 三、「遺民性」企圖與「詩史」意向合流： 《錢注杜詩》

當進入《錢注》窺掠「遺民性」企圖前，要先辨析二問題：

一，《讀杜小箋》、《讀杜二箋》為漁洋評說依據，但《錢注》卻非王詩旨寓對象。本文所論：從山谷「以杜子美為標準」<sup>76</sup>處接得「風雅」、「忠義」判讀取向，由遺山之遭際攫取「國事蝸蟻」、「世變運會」解釋契機；原在《讀杜小箋》、《讀杜二箋》中已隱括，足供作分析依據。而本文自《錢注》論起，乃冀由周覽清初杜詩學全景的視角，捕

<sup>75</sup> 晚明詩歌創作觀念，已將「詩史」、「比興」合流。見嚴志雄，《錢謙益〈病榻消寒雜咏〉論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2年），頁67-96；蔡英俊，〈「詩史」概念再界定——兼論中國古典詩中「敘事」的問題〉，收入蔡英俊等，《臺灣學術新視野：中國文學之部（一）》（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7年），頁1-21；蔡英俊，〈詩歌與歷史：論詩史的歷史成分及其敘述的轉向〉，《清華中文學報》第3期（2009年12月），頁239-272；李欣錫，〈春光中遺動的「秋興」——論錢遵王《判春集》及對錢牧齋「詩史」觀之實踐〉，收入李貞慧主編，《中國敘事學：歷史敘事詩文》（新竹：清華大學出版社，2016年），頁316-321。

<sup>76</sup> 〔宋〕黃庭堅著，鄭永曉整理，〈跋高子勉詩〉，《黃庭堅全集輯校編年》，冊下，頁1531。

捉詮釋境域下「錢、盧」意義興起的樣貌。<sup>77</sup> 準此，做為完整呈現牧齋箋杜心志變化，引領杜詩學動態發展的專著，其重要性不容忽視。

二，牧齋曾斥「學杜詩者莫不善於黃魯直」，及「弘、正之學杜者，生吞活剝，以尋擄為家當，此魯直之隔日瘡也」。<sup>78</sup> 若此，將如何「通其條貫」？實所掎擊，一在〔宋〕苛細句法，一在〔明〕尺寸矩矱，殆由辨識「杜之真脈絡」初心，因追究七子膚學、詰責江西窮法而牽連山谷，<sup>79</sup> 非逕要抹煞其一往崇杜的瓣香履跡。且牧齋有意建構學杜詩學譜系，既闡揚微言大義，彰顯杜甫主觀情志；故以宋人「皆有比托」為鑿空議論。復發明「轉益多師」學習管道，以能閱讀文本背後情志，又能突出自身「作者之能事」者入列；故重視詩人性情與遭際。此二點，取衡本文論山谷意見，實不乏相契處。<sup>80</sup>

### （一）包羞忍恥，據「遺民性」企圖修訂舊注

晚年，牧齋重啟箋、注，舉〈玄元皇帝廟〉諸箋，極言一新氣象之價值；<sup>81</sup> 本文因先據〈諸將五首〉分析，歸納修訂大要如下：

<sup>77</sup> 《錢注》所增訂，一在循「遺民性」企圖張皇己志，一在確立「詩史」評價意向。透過《錢注》成書背景，確能彰顯「明清之際」視域下的詩學景觀，指出王詩的寫作意圖。蓋錢、盧杜詩學成就在明亡前已奠定，經王詩刻意拉抬、確立為當代注杜典範，實為一有意識的安排，其中，漁洋居遺民世界中被觀看的眼光，及其積極之代興願望，殆為最要緊的關節，而惟借《錢注》使力，始得彌補《讀杜小箋》、《讀杜二箋》在解釋上的不足。

<sup>78</sup> 〔清〕錢謙益，《讀杜小箋上》，《初學集》，收入〔清〕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錢牧齋全集》，冊3，卷106，頁2153-2154。

<sup>79</sup> 參廖美玉，〈錢牧齋論學杜在建構詩學譜系上的意義〉，《文與哲》第15期（2009年12月），頁291-292。

<sup>80</sup> 廖美玉，〈錢牧齋論學杜在建構詩學譜系上的意義〉，頁312、315、317。

<sup>81</sup> 參〔清〕錢謙益，〈吳江朱氏杜詩輯注序〉，《有學集》，收入〔清〕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錢牧齋全集》，冊5，卷15，頁699；〈與遵王〉，《錢牧齋先生尺牘》，《牧齋雜著》，冊7，卷2，頁323-334；〔唐〕杜甫著，〔清〕錢謙益箋注，〈草堂詩箋元本序〉，《錢注杜詩》，冊上，頁3-4。

1.取徑漢代故實，著眼盛唐興廢：

〈諸將五首〉其一，為凸顯「祿山作逆，繼以吐蕃」<sup>82</sup>，胡虜入關，駭有「發掘之虞」；「注」引張載（1020-1078）〈七哀詩二首〉，續《九家集注杜詩》言：「季世喪亂起，賊盜如豺虎。毀壞過一抔，便房啓幽戶。珠柙離玉體，玳寶見剽虜。」又引魏文帝曹丕（187-226）《典論·論文》：「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柙金鏤，體骨并盡。」<sup>83</sup> 俾讀者視線由〔漢〕「北芒」轉向〔唐〕醴泉、金粟山，遙望昭、泰諸陵。遂更強化「昨日玉魚蒙葬地，早時金盃出人間。」<sup>84</sup> 之現實感受。

2.借鑒唐代史事，突出晚明人物：

〈諸將五首〉其二，舊注述張仁愿（?-714）築受降城事，<sup>85</sup> 致慨盡煩回紇，翻救朔方。錢氏引呂溫（772-811）〈三受降城碑銘并序〉：

大略方運，元勳不集，……吾知韓公不瞑目於地下矣。<sup>86</sup>

獨發明張公「不瞑目於地下」慊恨。尤「箋」曰：

張仁愿築城虜腹中，……不及百年，而羯胡作逆，回鶻助順，堂堂中夏，借力犬羊，以資匡復，國勢之寢衰如此，邊事之倒

<sup>82</sup> 〔唐〕杜甫著，〔清〕錢謙益箋注，〈諸將五首〉，《錢注杜詩》，冊下，卷15，頁514。

<sup>83</sup> 〔晉〕張載，〈七哀詩二首〉，見〔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臺北：藝文印書館，2012年），卷23，頁336。

<sup>84</sup> 〔唐〕杜甫著，〔清〕錢謙益箋注，〈諸將五首〉，《錢注杜詩》，冊下，卷15，頁513。

<sup>85</sup> 〔後晉〕劉昫等，〈張仁愿傳〉，《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冊10，卷93，頁2982。

<sup>86</sup> 〔唐〕杜甫著，〔清〕錢謙益箋注，〈諸將五首〉，《錢注杜詩》，冊下，卷15，頁515。

置如此，不亦傷乎！<sup>87</sup>

儼然身丁末季、遭厄陽九之悲痛自陳。顧〔明〕熹宗天啟二年（1622），孫承宗（1563-1638）以兵部尚書督山海關軍務，「修復大城九、……拓地四百里，開屯五千頃，歲入十五萬。」孰料魏忠賢（1568-1627）構陷，高第（1558-1639）代經略，所設置寢廢撤矣。<sup>88</sup> 牧齋與孫氏誼兼師友，感慨遂深，<sup>89</sup>《錢注》惜有唐國勢、邊事寥落及哀韓公張仁愿，即婉斥大明不能扼建州，並傷己與孫公輩未見用；「賢愚迭任，工拙異勢」，<sup>90</sup> 千載後亦然。

3.揭發有唐弊端，表揚「諸將」典型：

〈諸將五首〉其四，舊注沿襲呂太一（?-?）舉兵叛故事，偏責將帥邀功，居高爵不能輸忠。<sup>91</sup> 該本事內證出杜甫〈自平〉，牧齋嘗劍指「中官掌禁軍者」注；<sup>92</sup> 至本題「箋」曰：

楊思勳討安南五溪，……呂太一收珠南海，……李輔國以中官拜大司馬，……魚朝恩等以中官為觀軍容使，……安得偏信一二人，據將帥之重任，自取潰債乎！<sup>93</sup>

銜李、魚輩專擅弄權，釋「司馬」、「總戎」、「侍中」等職分紊亂，意

<sup>87</sup> 〔唐〕杜甫著，〔清〕錢謙益箋注，〈諸將五首〉，《錢注杜詩》，冊下，卷15，頁515。

<sup>88</sup> 〔清〕張廷玉等，〈孫承宗列傳〉，《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冊20，卷250，頁6468、6472-6473、6476。

<sup>89</sup> 見〔清〕，錢謙益，〈孫公行狀〉，《初學集》，收入〔清〕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錢牧齋全集》，冊2，卷47，頁1160-1238。

<sup>90</sup> 〔唐〕呂溫，〈三受降城碑銘并序〉，轉引自〔唐〕杜甫著，〔清〕錢謙益箋注，〈諸將五首〉，《錢注杜詩》，冊下，卷15，頁515。

<sup>91</sup> 如黃鶴、劉辰翁（1232-1297）。

<sup>92</sup> 〔唐〕杜甫著，〔清〕錢謙益箋注，〈自平〉，《錢注杜詩》，冊上，卷5，頁158。

<sup>93</sup> 〔唐〕杜甫著，〔清〕錢謙益箋注，〈諸將五首〉，《錢注杜詩》，冊下，卷15，頁517。

在規諫；旨轉「深戒朝廷不當使中官出將」。<sup>94</sup> 寔具歷史的眼光和評判意識。又〈諸將五首〉其五注「數舉盃」，往依趙次公：

言其治軍整肅，所以不妨舉杯之頻數也。<sup>95</sup>

謂嚴武（726-765）治軍、理政有道。牧齋則云：

新書：鴻漸入成都，政事一委崔寧，……八哀詩，於嚴武云：  
豈無成都酒，憂國只細傾。則鴻漸之縱飲，於憂國之志荒  
矣。<sup>96</sup>

集矢於後任杜鴻漸（709-769）不事事，藉對比嚴武憂國；「箋」曰：  
「昔人之三杯，何如今人之縱飲。」<sup>97</sup> 今昔高下，循舉觴之數若可判  
定，孰為出群材，則思過半矣。

以上，要在強化杜詩已豐厚的現實內涵，將掃視唐史眼光投向明清之際，轉化為個人承載大時代的不平之鳴。從內在意義看，上接黃、元推闡——由超越視角觀察杜甫心靈世界，開展「詩史」批判、關懷的詮釋面向；而實際操作，則鎖定古典、今事，雕鑿微言，藉杜公中興期待，鋪揚己南枝踟躕、西臺痛哭之易代悲楚。如前〈諸將五首〉其一注「曾閃朱旗」，由《英華辨證》引入班固（32-92）〈封燕然山銘并序〉，因知「朱旗」，漢幟也，更覽「箋」云：「指胡虜焚宮之煙焰，故曰曾閃朱旗。」輒意會：昔「朱旗絳天」，值竇憲（？-92）破單于，星流彗埽、刻石勒功；今唐旗閃見，當「宮殿化為烽」，乃同焚一炬、光映星斗。<sup>98</sup> 不亦悲夫！若此等，刻在〈諸將五首〉內，鉅細靡遺挖

<sup>94</sup> 〔唐〕杜甫著，〔清〕錢謙益箋注，〈諸將五首〉，《錢注杜詩》，冊下，卷15，頁516-517。

<sup>95</sup> 〔唐〕杜甫著，〔宋〕趙次公注，林繼中輯校，〈諸將五首〉，《杜詩趙次公先後解輯校》，冊中，丁軼卷6，頁841。

<sup>96</sup> 〔唐〕杜甫著，〔清〕錢謙益箋注，〈諸將五首〉，《錢注杜詩》，冊下，卷15，頁517。

<sup>97</sup> 〔唐〕杜甫著，〔清〕錢謙益箋注，〈諸將五首〉，《錢注杜詩》，冊下，卷15，頁517。

<sup>98</sup> 〔唐〕杜甫著，〔清〕錢謙益箋注，〈諸將五首〉，《錢注杜詩》，冊下，卷15，頁514、516。

出本朝／故國消息，復黯闌入竄身奔命之偷生困窘、殘年播越之復明心志，用移人情、深肺腑，召喚同聲；《錢注》即在這寬宏史識、狡獪酸辛激發下，逐步展露其「明遺民性詩學」的企圖。

當然，箋、考過程不免疏忽，以〈諸將五首〉其五為例，「三持節」於明瞭嚴氏「當安危之寄」<sup>99</sup> 大任，極重要，舊注率多剖判；牧齋略此詳彼，在〈八哀·贈左僕射鄭國公嚴公武〉：「四登會府地，三掌華陽兵」<sup>100</sup> 處分辨。本注，趙次公首披榛莽，郭、蔡、黃氏輾轉因襲，逮《錢注》始是正之。惟次公昧於《資治通鑑》錯誤，倡「寶應元年六月」「再鎮」之說，忽略劍南、京畿往返計程，及嚴武九月尚未出川事實；牧齋又揣言「未久而節度東川」，<sup>101</sup> 意嚴武自巴州刺史節度東川，為李旻（？-？）前任，復自東川入朝，在段子璋（？-761）亂前。是皆於史無據。<sup>102</sup> 而實際上，該甄別工作受限史料闕、誤，格外艱辛，<sup>103</sup> 即今，細節考訂未盡周備，學者意見兩歧；<sup>104</sup> 審校《錢注》成果，仍應肯定涉足險域之功。

<sup>99</sup> 〔唐〕杜甫著，〔清〕錢謙益箋注，〈諸將五首〉，《錢注杜詩》，冊下，卷 15，頁 517。

<sup>100</sup> 〔唐〕杜甫著，〔清〕錢謙益箋注，〈八哀·贈左僕射鄭國公嚴公武〉，《錢注杜詩》，冊上，卷 7，頁 204。

<sup>101</sup> 以上引文，見〔唐〕杜甫著，〔清〕錢謙益箋注，〈八哀·贈左僕射鄭國公嚴公武〉，《錢注杜詩》，冊上，卷 7，頁 205。

<sup>102</sup> 〔唐〕杜甫著，〔宋〕趙次公注，林繼中輯校，〈故左僕射鄭國公嚴公武〉，《杜詩趙次公先後解輯校》，冊中，丁帙卷 1，頁 699。

<sup>103</sup> 「史于武傳，不記其遷拜出鎮之歲月，而兩川之分合，新舊書志表與諸書互異，莫能歸一。」見〔唐〕杜甫著，〔清〕錢謙益箋注，〈八哀·贈左僕射鄭國公嚴公武〉，《錢注杜詩》，冊上，卷 7，頁 205。

<sup>104</sup> 周勛初，《高適年譜》，《周勛初文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 年），冊 4，頁 82-92；吳在慶、曾曉云，〈嚴武再帥劍南抑或三鎮蜀川考〉，《周口師範學院學報》2007 年第 1 期，頁 28-30；陳樂保，《唐代劍南道研究——以政治地理與戍防體系為中心》（濟南：山東大學中國古代史專業博士論文，2015 年），頁 40-51；簡錦松，〈杜甫〈八哀詩〉新注〉，收入吳宏一教授六秩晉五壽慶暨榮休論文集編輯小組編，《吳宏一教授六秩晉五壽慶暨榮休論文集》（臺北：里仁書局，2008 年），頁 814-815。

## (二) 罹憂於邑，借「杜家箋傳」張皇己志

牧齋將詩歌傳統之「香草美人」象徵手法、創作訣竅，大量移植於「杜家箋傳」，抒解個人「罹憂於邑」，為焦躁的情志尋找出口。這是其所引動、一場開創性書寫變革；筆者認為：如許精心擘畫、森然結構，執意跨出文類邊界而全力突圍之箋注／創作意識，正揭櫫其為己翻案的堅定信念，儼可視為屈原（343-278 B.C.）被讒煩亂之行吟初衷的擴大再現。

牧齋擲節完成「自傳性」作業，<sup>105</sup> 是當體現於《錢注》結集過程；其借「箋傳」刻露「己志」，如何攢聚為另一有效的詮釋意向而發聲？本文循〈諸將五首〉其二，探求解答：

前論「三城」詩注，厥見孫承宗經略遼東、壯心孤迥；本事畫框中，因加入牧齋時空、視線位置，以下句解、章旨，尋依約轉向。諸家悉就「恃功侵擾」發揮，<sup>106</sup> 惟錢「注」不然，曰：

回紇太子葉護自將助討祿山，……回紇馳剪其伏，出賊背夾彥之，賊大敗，遂收長安，……由此觀之，汾陽以朔方孤軍，收復兩都，皆賴回紇助順之力。……故知助順之功，不獨在朔方矣。<sup>107</sup>

多敘戰爭場景，描繪入微；又狀回紇勇決，歸功彼「助順」之力，反責朔方軍失職，甚可怪。及讀本「箋」始悟，蓋陳老杜「寓勸勉」、「惜郭氏」諸意：

往余沿襲舊聞，謂責諸將不應借助於回紇。當盜發幽陵，天子

<sup>105</sup> 此借用嚴志雄說法。嚴志雄，《錢謙益〈病榻消寒雜詠〉論釋》，頁 67-96。

<sup>106</sup> 〔唐〕杜甫著，〔宋〕趙次公注，林繼中輯校，〈諸將五首〉，《杜詩趙次公先後解輯校》，冊中，丁軼卷 6，頁 838。

<sup>107</sup> 〔唐〕杜甫著，〔清〕錢謙益箋注，〈諸將五首〉，《錢注杜詩》，冊下，卷 15，頁 515。

西走，汾陽提朔方孤軍，轉戰逐北，香積之翦伏，西嶺之却迴，非回紇協力奮擊，或出其背，或出其後，勝負未決，兩都之收復未可知也。當此之時，能預料其怙恩肆掠，逆而拒之乎？魏勃曰：失火之家，當先白大人，後救火乎？此切諭也。……少陵於此時，惜之可也，訟之可也。又何庸執三寸之管，把其短長乎？<sup>108</sup>

斯時軍情緊急、形勢危殆，倘失回紇臂助，侈言兩都收復。故「香積」、「西嶺」不惟述協力制勝，乃凸顯為救眉燃，君、臣無暇他慮耳！「箋」首云：「沿襲舊聞」，蓋敘趙注，謂中興關鍵，在肅宗（711-762）正位、天下歸心；對西北門戶洞開，遂不假辭色。<sup>109</sup> 牧齋《讀杜小箋》採此說，<sup>110</sup> 入清後，改口「魏勃曰」云云，旋以借兵為勤王急著，是轉覷定郭、李輩而褒譽忠忱，亦一抒己心中抑鬱耶？

牧齋因兩載人生飽受譏嘲，恆怏怏；故「箋」頗自解：南京城破倉卒，豈待白世人隱忍圖存，再虛獻降表乎？於是，詩旨一改「責」為「勸勉」諸將。<sup>111</sup> 費心剪裁、修削合度的文字後，彷彿見牧齋壓低嗓音，戴上箋注「面具」，畢陳艱難苦恨、潦倒新亭；但其蜷縮的姿態漸次舒展，故宮落葉、澤畔行吟之悲聲卻愈發嘹亮。究之，這是牧齋懇切的遺民哀懷、身世哀歌；惟惜此一鄭重的「自傳性作業」，注定須施朱傅粉後方得曲意完成。

當「罹憂於邑」情感驅使，《錢注》與《有學集》、《投筆集》詩，

<sup>108</sup> [唐]杜甫著，[清]錢謙益箋注，〈諸將五首〉，《錢注杜詩》，冊下，卷15，頁515。

<sup>109</sup> [唐]杜甫著，[宋]趙次公注，林繼中輯校，〈諸將五首〉，《杜詩趙次公先後解輯校》，冊中，丁軼卷6，頁838。

<sup>110</sup> [清]錢謙益，《讀杜小箋下》，《初學集》，收入[清]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錢牧齋全集》，冊3，卷108，頁2177。

<sup>111</sup> 〈諸將五首〉其四例可參[唐]杜甫著，[清]錢謙益箋注，〈諸將五首〉，《錢注杜詩》，冊下，卷15，頁517。朱氏《杜工部詩集輯注》即引錢說。

莫不循感事內容、興寄手法而刻畫自身、評價歷史；〈哀江頭〉箋為其中著例。茲分析該借另類廬詞隱語恢張情志、演繹「詩史」之布局安排，嘗鼎一臠。本題，少陵「陷賊中」<sup>112</sup>時作，次公引蘇轍（1039-1112）「〈哀江頭〉即〈長恨歌〉」<sup>113</sup>語，初著眼於敘事簡省比較；錢「箋」續言：

此詩興哀於馬嵬之事，專為貴妃而作也。……清渭、劍閣，寓意於上皇、貴妃也。……清渭以西，劍閣以東，豈非蛾眉宛轉血污遊魂之地乎？……興哀無情之地，沉吟感歎，瞽亂迷惑，雖胡騎滿地，至不知城之南北，此所謂有情癡也。陸放翁但以避死惶惑為言，殆亦淺矣。<sup>114</sup>

轉側重楊貴妃（719-756）「宛轉蛾眉馬前死」<sup>115</sup>之「事」與「血污遊魂歸不得」之「地」而大筆摹寫；長篇議論，誠由〈長恨歌〉居中聯繫。曰：「清渭以西，劍閣以東」，<sup>116</sup>因將白氏「此恨」、杜詩「有情」齊收攏於馬嵬，點染天地愴愴。馬嵬，國事也；杜甫〈北征〉以「誅褒姒」為「國猶活」之機，《錢注》更階「桓桓陳將軍」於管仲（?-645 B.C.）攘夷。<sup>117</sup>吁此內情，智者難辨！如錢鍾書（1910-1998）云：

<sup>112</sup> [唐]杜甫著，[清]錢謙益箋注，〈古詩五十五首〉，《錢注杜詩》，冊上，卷1，頁1。

<sup>113</sup> [唐]杜甫著，[宋]趙次公注，林繼中輯校，〈哀江頭〉，《杜詩趙次公先後解輯校》，冊上，乙帙卷2，頁180。按，《樂城集》未見，次公殆聞諸蜀人石耆翁（?-?）。

<sup>114</sup> [清]，錢謙益，〈哀江頭〉，《讀杜小箋上》，《初學集》，收入[清]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錢牧齋全集》，冊3，卷106，頁2160。

<sup>115</sup> [唐]白居易著，謝思焯撰，〈長恨歌〉，《白居易詩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冊3，卷12，頁943。

<sup>116</sup> [清]，錢謙益，〈哀江頭〉，《讀杜小箋上》，《初學集》，收入[清]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錢牧齋全集》，冊3，卷106，頁2160。

<sup>117</sup> [唐]杜甫著，[清]錢謙益箋注，〈北征〉，《錢注杜詩》，冊上，卷2，頁59。

夫「人生」二句乃謂水長流而花仍發，以無情故，人非木石，則家國興悲……；與「天長」二句之旨，如風馬牛。<sup>118</sup>

遂又致譏：「『我聞室』中人多暇日而生綺愁，宜其不能領略孤危皇遽之況」。<sup>119</sup> 實牧齋乃深諳李商隱（812-858）「縱浪香奩」，「起興比物，申寫託寄」箇中三昧，<sup>120</sup> 李商隱〈曲江〉曰：「天荒地變心雖折，若比傷春意未多。」正借「傾城」不返說明「傷春」所隱含家國頓擗之頹勢；<sup>121</sup> 則貴妃消殞，是可敵「天荒地變」摧折五內。其次，牧齋曰：「興哀于無情之地」，<sup>122</sup> 取資陸機（261-303）〈弔魏武帝文一首〉序；<sup>123</sup> 昔陸氏遊秘閣，傷魏武曹操（155-220），今少陵潛行曲江，興哀于馬嵬之事，豈非一如作者，悄然思接無情之地耶？尤〈弔魏武帝文一首〉序末，以「居常安之勢，而終嬰傾離之患」<sup>124</sup> 解客問難，若輾轉道破老杜沈吟感歎、誓亂迷惑之「不忍言」情感所由。自是，「昔人所謂有情癡」<sup>125</sup> 殊不費解，乃推原唐室／世變肇亂之幾，彰顯殷鑑意義的古今至情。當此「揭露興廢」的自覺、期待下，陸游（1125-1210）固宜退舍也！<sup>126</sup>

<sup>118</sup> 錢鍾書，《管錐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冊3，「三九 全後漢文卷二〇」條，頁1565。

<sup>119</sup> 錢鍾書，《管錐編》，冊3，「三九 全後漢文卷二〇」條，頁1566。

<sup>120</sup> 李欣錫，〈錢牧齋〈讀梅村宮詹豔詩有感書後四首〉析論〉，《清華中文學報》第3期（2009年9月），頁1-42。

<sup>121</sup> 〔唐〕李商隱著，劉學鍇、余恕誠集解，《李商隱詩集解》（臺北：洪業文化事業公司，1992年），冊上，頁133、138。參歐麗娟，《李商隱詩歌》（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3年），頁18-27。

<sup>122</sup> 〔唐〕杜甫著，〔清〕錢謙益箋注，〈哀江頭〉，《錢注杜詩》，冊上，卷1，頁43。

<sup>123</sup> 〔晉〕陸機，〈弔魏武帝文一首〉，見〔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卷60，頁849。

<sup>124</sup> 〔晉〕陸機，〈弔魏武帝文一首〉，見〔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卷60，頁849。

<sup>125</sup> 〔唐〕杜甫著，〔清〕錢謙益箋注，〈哀江頭〉，《錢注杜詩》，冊上，卷1，頁43。

<sup>126</sup> 參胡曉明，〈陳寅恪與錢鍾書：一個隱含的詩學範式之爭〉，《詩與文化心靈》（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頁245-256。

若所詮釋，方觸及錢「箋」本旨，是可進言：牧齋罹憂於邑情感，不僅畢陳於詩，且挾「杜家箋傳」匯為明清之際「遺民性」獨特聲腔，繚繞不絕。

### (三) 回歸杜老心眼，確立「詩史」評價意向

兩度政治失節，牧齋人格委地；乾隆帝（1711-1799）加意禁毀，更幾令青史中絕跡。今日視之，經滅絕式打壓猶谷底翻身，除歸功於間道奔走、交通復明諸舉外，秉如椽大筆，躬視「自傳性作業」，要為掙脫桎梏、扭轉局面的利器。牧齋入清，初戒作詩文，復傾力營造一詩中隱微的暗碼系統、意義脈絡，構築易代間遯世安身的壺中天地；是在遺民群體共同記憶、祕密分享且心靈默契之創作、閱讀體驗中，獨造幽徑；不僅極大限度深化了寄寓心志、發皇心曲的暗示手法，更積極曼衍此意識，延續至箋杜工作，重組箋注方式，擴大詮說的內涵和效度。由是，牧齋詩、錢曾（1629-1701）注在「比興寄託於斯，安身立命於是」意義下為同一「作業」文本；《錢注》亦當納入文本脈絡中重新認識。

本文既發見牧齋議論世變、招己「生魂」之「遺民性」企圖，欲更追辨詮釋立場、評價意向，而此最佳參照對象，厥為朱鶴齡《杜工部詩集輯注》。雙方針鋒相對，俱擇〈洗兵馬〉為戰場，藉指出它本謬誤，角力攻堅。於是，本詩成考較錢、朱異同的最佳示例。

宋注以降，持本詩勾畫完整圖象，牧齋允為第一人。<sup>127</sup> 先是，「注」揭出「鶴禁」、「龍樓」、「鳳輦」侷促於一聯內尷尬處境，<sup>128</sup> 間

<sup>127</sup> 此前，惟蔡夢弼拈「安不忘危，治宜念亂」，申論天下昇平，逸士無復逃秦。見〔唐〕杜甫撰，〔宋〕蔡夢弼注，〈洗兵馬〉，《杜工部草堂詩箋》，《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據清光緒黎庶昌刻《古逸叢書》本影印），冊1307，卷11，頁13b。

<sup>128</sup> 〔唐〕杜甫著，〔清〕錢謙益箋注，〈洗兵馬〉，《錢注杜詩》，冊上，卷2，頁65-66。《讀杜

接質疑了「雞鳴問寢」<sup>129</sup>者身分，也透露肅宗難迴避其位不正的責難。<sup>130</sup>又據該聯為樞紐，上節述二三豪俊濟時之功，故得收京；下節云：房琯（697-763）、張鎬（?-764）、李泌（722-789）攜手，可望河清。前者整頓乾坤、運籌帷幄，後者扶顛持危、指揮若定；一頌美收京前之奮迅，一冀盼中興後長治久安。較前賢僅由字面操戈，於詩意秋毫無犯；《錢注》蓋熟視深思後乃得茲判斷。<sup>131</sup>

其次，「箋」分二段張本。首段，數云「致太平」、「太平之效」等，是調：房、張、李氏為澄清天下的要角。後段，由房、杜關係領起，要在斥肅宗，鉤人臣為黨，羅織罪狀。準此，牧齋揭出靈武、蜀郡間之矛盾；箋曰「刺肅宗」，除為「不能盡子道」而發，更意在「不能信任父之賢臣」。<sup>132</sup>縝密設計的「箋」文，依本「注」及所敷衍全詩景貌，包裹為密實、難攻破之詮釋意向；將肅宗、上皇擘為壁壘分明兩方，經策略性鋪陳、敘述，層層逼近，遂歸結於「余讀杜詩，感雞鳴問寢之語、考信唐史房琯被譖之故」<sup>133</sup>云。

房琯、張鎬、李泌，處玄、肅二宮間，角色關係複雜。初，玄宗（685-762）幸蜀，房琯馳「普安上謁」，張鎬亦「徒步扈從」；肅宗即位，房琯尋「奉冊靈武」，張鎬又遣赴鳳翔；二氏皆蜀郡元臣，復效力靈武左右。至於李泌，由嵩、穎間「冒難奔赴行在」，為肅宗延致，然無時不以上皇為念。三人德尊一代，卻分遭貶謫、罷相、歸隱之命運；<sup>134</sup>牧齋揣度原因，歸咎和上皇連結甚密使然。該論述方向，凸

小箋》、《讀杜二箋》並已申言。

<sup>129</sup> [唐]杜甫著，[清]錢謙益箋注，〈洗兵馬〉，《錢注杜詩》，冊上，卷2，頁65。

<sup>130</sup> 杜甫嫻於禮制，此蓋婉言之。《錢注》貢獻、開創性由此可見；但該說爭議兩歧，聚訟尤多。

<sup>131</sup> 參林繼中，〈杜詩〈洗兵馬〉錢注發微〉，《中華文史論叢》2011年第3期，頁335-368。

<sup>132</sup> [唐]杜甫著，[清]錢謙益箋注，〈洗兵馬〉，《錢注杜詩》，冊上，卷2，頁67。

<sup>133</sup> [唐]杜甫著，[清]錢謙益箋注，〈洗兵馬〉，《錢注杜詩》，冊上，卷2，頁68。

<sup>134</sup> 三人事跡，見新、舊《唐書》本傳。分見〔後晉〕劉昫等，〈房琯傳〉，《舊唐書》，冊10，卷111，頁3320-3326；〈張鎬傳〉，冊10，卷111，頁3326-3328；〈李泌傳〉，冊10，卷130，

顯肅宗厚靈武、黜蜀郡之別有用心；若取朱注對勘，其首言：「蓋以太平之功望肅宗也。」<sup>135</sup> 可預見，「望」、「刺」視野大不同，決定兩注背道而馳的結果。

朱鶴齡注也自具脈絡，若不論解釋扞格，細讀「補注」，即獲悉與錢「箋」對峙的意圖。朱氏將詩分三段，「中興諸將」以下，贊郭子儀（697-781）朔方軍功；「成王功大」以下，謂「人主復修子道，而諸臣多被爵賞為侯王」；「關中既留」以下，曰「獨詳稱張鎬」，「翼其復用於時」；終歸諸「若玄、肅父子之間，公爾時不應遽加譏切。」結論。<sup>136</sup> 要之，「復修子道」已透露雙方立場歧異；獨重「張子房／張鎬」而對「蕭丞相／房瑄」不置一辭，更知朱鶴齡全無意談論房瑄。<sup>137</sup>

筆者認為，朱注最須留心處，即房瑄消失了。此於錢注關係甚大，可由兩端說明：

一、房瑄罷相，甫疏救不成，遂坐瑄黨。乾元元年（758）六月，肅宗下詔貶瑄，嚴武、劉秩（？-？）、杜甫併及之；<sup>138</sup> 此舉牽動老杜日後行止，遂有入蜀、遷夔之流離，然其右瑄，曾無改易。牧齋慕少陵為人，每讀公詩，傷世路干戈、白首濩落，莫不太息！故生平精力老於注杜，將三十載，更輒以杜公自許，最明瞭其心志。〈洗兵馬〉

---

頁 3620-3625；〔宋〕歐陽修、宋祁，〈房瑄傳〉，《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冊 12，卷 139，頁 4625-4630；〈張鎬傳〉，冊 12，卷 139，頁 4630-4631；〈李泌傳〉，冊 12，卷 139，頁 4631-4639。

<sup>135</sup> 〔唐〕杜甫著，〔清〕朱鶴齡輯注，韓成武等點校，〈洗兵馬〉，《杜工部詩集輯注》（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9年），卷 5，頁 186。

<sup>136</sup> 以上引文，見〔唐〕杜甫著，〔清〕朱鶴齡輯注，韓成武等點校，〈洗兵馬〉，《杜工部詩集輯注》，卷 5，頁 186。

<sup>137</sup> 前賢少言李泌，但該角色提出，《錢注》中有特殊意義。林繼中頗將李泌指「張子房」，但關注「不應遺李泌於『中興』人物之外」。林繼中，〈杜詩〈洗兵馬〉錢注發微〉，頁 339-341。

<sup>138</sup> 〔宋〕宋敏求編，李希泌主編，毛華軒等編，《唐大詔令集補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冊上，卷 16，頁 695。

箋曰：「拜房相之墓，哭其旅櫬」，<sup>139</sup> 蓋指〈別房太尉墓〉、〈承聞故房相公靈櫬歸葬東都二首〉諸詩也。

二、房琯建分鎮之議。<sup>140</sup> 據聞，安祿山（703-757）見詔書，撫膺歎：「吾不得天下矣。」<sup>141</sup> 知房琯借箸代籌，實切中要害。牧齋極看重該布局、發展之連鎖效應，視為敵我消長的轉機，故〈別房太尉墓〉、〈建都十二韻〉均著意發論，注〈洗兵馬〉亦然；箋曰：「肅代間論事，則于封建三致意焉」，此之謂也。<sup>142</sup>

合前述，牧齋詳論房琯，乃由老杜居心出發，亦由「分鎮」行、妖氛豁之綜覽全局針砭意識出發。因知，牧齋注杜，循老杜之眼直勘唐史憂患，潛入時代呼息，化為嘯嗟議論。抱此素心外，更懷一艱苦卓絕夙志，即覷定——推原世變肇亂之幾，以資「致太平」之效——宏遠目標而覃思邃深；故一反冷眼旁觀盛衰常態，改投入自身悲辛，演繹亂世中蒼白靈魂和凋萎的命運；於是，《錢注》成為解釋、評判歷史的文本，個人色彩濃厚。相較下，《杜工部詩集輯注》令「房琯消失」，意味著杜甫的身影淡出了，若然，牧齋鬱積情感，藉盛唐中衰提挈明清易代枯槁形容之初衷，及發露杜公「潛行曲江」、「淨洗甲兵」<sup>143</sup> 之秋槐丹心、惓惓赤誠，嫁接為一湔雪前塵之自傳性作業、一贏取史論身段發言權之文學行動的企想，不啻遭完全抹煞。<sup>144</sup> 此故錢、朱不相為謀的根本原因。

<sup>139</sup> 〔唐〕杜甫著，〔清〕錢謙益箋注，〈洗兵馬〉，《錢注杜詩》，冊上，卷2，頁67。

<sup>140</sup> 見〔後晉〕劉昫等，〈房琯傳〉，《舊唐書》，冊10，卷111，頁3322；〔宋〕歐陽修、宋祁，〈房琯傳〉，《新唐書》，冊12，卷139，頁4626。

<sup>141</sup> 〔唐〕杜甫著，〔清〕錢謙益箋注，〈有感五首〉，《錢注杜詩》，冊下，卷12，頁431。

<sup>142</sup> 以上數篇，分見〔唐〕杜甫著，〔清〕錢謙益箋注，〈建都十二韻〉，《錢注杜詩》，冊下，卷11，頁380；〈有感五首〉，冊下，卷12，頁431；〈別房太尉墓〉，冊下，卷13，頁451；〈洗兵馬〉，冊上，卷2，頁67。

<sup>143</sup> 分見〔唐〕杜甫著，〔清〕錢謙益箋注，〈哀江頭〉，《錢注杜詩》，冊上，卷1，頁42；〈洗兵馬〉，冊上，卷2，頁65。

<sup>144</sup> 莫礪鋒，〈朱鶴齡杜詩輯注平議〉，《古典詩學的文化觀照》，頁245。

今論者於《錢注》或致微詞，蓋因指斥太過，與當日社會情感、普遍期待相左，與杜集同時諸作「喜躍之象」異趣；然此一牧齋布置，與傳統詮釋落差而形成的衝突張力，實滲透其「歷史文化背景的轉換以及個人特殊的經歷與性情諸原因」，雖招徠「強杜以從我」等批評，卻不乏合理、深刻性，同時，亦極具啟發性。<sup>145</sup> 吾人所須關注，應在注家如何認為自己合理地從整體把握了杜甫？

筆者認為，牧齋非對杜詩不甚了了，故生曲解；相反地，正因刻意貼近，且精準調校了捕捉杜甫身影、動作之焦距、視角，愈發清晰體認：杜公遭臨之時代困境、處遇限制，及所取舍、決斷、評價的盱衡格局。從而，由個人世變中經驗記憶出發、回望，以穿越時空、透視歷史之炬眼拿捏分寸，揭顯詩中折射的「明清之際」當代史意義。

#### 四、「以忠厚惻怛為主」：建構的「錢、盧」關係

盧世淮極偏嗜杜詩，〔明〕崇禎六年（1633）刻《杜詩胥鈔》成，寄牧齋斧正，從此頻繁聯繫、交誼密切。明亡前、入清後，牧齋南北往返，嘗寓居德州，勾留盧氏園亭，與諸友相攜酬酢；或亦藉手周濟，排解口禍獄案；益淬礪死生肝膽。迭多唱和，俱收錄二家集中。<sup>146</sup>

《杜詩胥鈔》誠有見地之選。其〈大凡〉：「專論杜之人品而間及於詩」，先謂公詩：「天壤精氣結成」、「忠厚之至」；進言：「溫柔敦重」、「是乃仁音」；繼曰：「戀主憂民，血忱耿耿」，「一片古今熱腸，萬里乾坤大眼」；結云：「以忠厚惻怛為主，而天人胥聽命焉。」<sup>147</sup> 究所提

<sup>145</sup> 林繼中，〈杜詩〈洗兵馬〉錢注發微〉，頁 362-368。

<sup>146</sup> 錢牧齋《初學集》、《有學集》，盧德水《尊水園集畧》。參方良，《錢謙益年譜》（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13年）；嚴志雄，《錢謙益〈病榻消寒雜詠〉論釋》，頁 167-185。

<sup>147</sup> 以上引文，見〔清〕盧世淮，《讀杜私言》，見王學泰編纂，《盧世淮詩話》，收入吳文治主編，《明詩話全編》，冊 9，頁 9099-9102、9104、9133。

煉橫絕古今、乾坤之仁厚忠愍，該論杜眼光、趣尚與山谷、遺山同，欲洞見歷史真相的意圖，則與牧齋並轡。若合結集《讀杜私言》賡補之《餘論》曰：「概論杜之詩品，而想見其人」參看，<sup>148</sup> 體系又更臻完善。

有關《讀杜私言》突破舊注及接續影響，學界寢多發微；然置諸「明清之際」視域下，德水是否傳達了特殊訊息？又緣何經漁洋擷取，藉〈戲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三十二首〉其五張大旗幟？今仍缺乏論述。蓋《讀杜私言》成書於晚明頽唐之際，尚未沾染國殤情懷，漁洋獨斷之杜詩學臆見如何生成？殆有凝望大歷史背景下特定人物遭際的決定因素。

錢、盧明亡後事跡，若干關節須審視。其一，甲申（1644）四月，李自成（1606-1645）陷京師，遣防禦使、州牧赴德；盧氏與程先貞（1607-1673）、謝陞（1547-1615）諸人謀，磔殺之。<sup>149</sup> 其二，丙戌（1646）六月，牧齋乞疾歸，自京師南還，「寓杜亭浹旬，與德水談詩甚快。」<sup>150</sup> 時值中秋，柳如是（1618-1664）施然來迎，以仙侶之姿同程、盧輩作文字飲。此前，牧齋因歸降、北遷，屢遭物議，夙夜懷冰，欲購得突圍津筏；此後，歷丁亥（1647）、戊子（1648）繫囚，遂開啟「擺落降清惡名」、「扭轉自我形象」之奮勵修為，從而確立「新

<sup>148</sup> [清]盧世淮，《讀杜私言》，見王學泰編纂，《盧世淮詩話》，收入吳文治主編，《明詩話全編》，冊9，頁9133。

<sup>149</sup> 田雯（1635-1704）撰〈盧南村公傳〉、〈謝公墓誌銘〉；徐鼐（1810-1862）撰《小腆紀傳·義師一》等。前述篇章，分見[清]田雯，〈盧南村公傳〉，《古歡堂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據清康熙乾隆間刻德州田氏叢書本影印），冊138，傳卷1，頁491-493；〈謝公墓誌銘〉，《古歡堂集》，冊138，銘表卷2，頁488-489；[清]徐鼐，〈義師一〉，《小腆紀傳》（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冊下，卷46，頁461。參陳寅恪，《柳如是別傳》（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冊下，頁896-899。

<sup>150</sup> [清]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冊下，丁集中，「鵝池生宋登春」條，頁517。

吾」身分。關鍵轉折，《秋槐詩集》、《秋槐詩支集》兩集概可窺見其端。<sup>151</sup>

審德水之文字、立身，向所依循、踐履者，寔乃全忠孝、盡節義，鼎革後未傾側也！故擒殺偽牧，端然無懼。其高自標置，婉拒清廷徵辟，對舊友則施加援手，一如曩日；不負牧齋引為「氣類相契之同道同志」<sup>152</sup>。惟自丙戌（1646）晤面後，二人再無相值，便成永訣矣！

倘加入前述本事為觀察「錢、盧」興起新視點，甲申（1644）、丙戌（1646）年風雲際會之德州，當提供極珍貴文學現場風貌，留下不少蛛絲馬跡；本節依此釐清、判讀，期藉以建構：明清之際，杜詩學意義的「錢王代興」。

### （一）《讀杜私言》黜〈同谷七歌〉而階〈曲江三章章五句〉

《讀杜私言》論杜標準、鑒賞品味，近世以來，博得甚多好評。<sup>153</sup> 仔細推究，其由「杜之人品而間及於詩」議論，頗受讀者認同，由「杜之詩品，而想見其人」分析，尤切中肯綮，綱舉目張；然亦有特為拈出、別白，仍滋生疑竇之例，最引人側目，即對〈同谷七歌〉之批駁，<sup>154</sup> 迥異於主流論調，不免掀軒然大波。蓋《杜詩胥鈔》為數量龐大的白文選本，剔除者僅十之二三，而〈同谷七歌〉赫然在

<sup>151</sup> 李欣錫，《錢謙益明亡以後詩歌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8年），頁125-151。參裴世俊，《錢謙益詩歌研究》（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147-167。

<sup>152</sup> 嚴志雄，《錢謙益〈病榻消寒雜詠〉論釋》，頁170。

<sup>153</sup> 綦維，〈德州學者盧世淮的杜詩學成就〉，《東岳論叢》2004年第4期，頁152；孫微，《杜詩學文獻研究論稿》（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68-82；詹杭倫、沈時蓉，《杜詩學管窺》，頁121-157。

<sup>154</sup> 以上引文與論述，見〔清〕盧世淮，《讀杜私言》，見王學泰編纂，《盧世淮詩話》，收入吳文治主編，《明詩話全編》，冊9，頁9100-9101、9108、9133。

列；觀所言，乃謂不稱「風騷之極」，<sup>155</sup> 惟〈曲江三章章五句〉足當之。審《讀杜私言·論七言古詩》曰：

〈曲江三章章五句〉塌翼驚呼，忽邀天際，國風之後又續國風。<sup>156</sup>

誠據「風雅」一端詮評高下；學者追查線索，疑其將（1）「嘆老嗟卑」之作，（2）「頗有諛氣」應酬詩什；泰半刪削。<sup>157</sup> 前一點，衡諸〈同谷七歌〉、〈曲江三章章五句〉情感傾向差異，所論差是；但「嘆老嗟卑」盍不被接受？本文認為，應出具更嚴密文本依據和檢證流程，方得坐實。

察《讀杜私言》中觀點，除數言忠、仁、惻隱、德愛價值，用影子美「以忠厚惻怛為主，而天人胥聽命焉」人品高度外，顯然，亦重視內心情感的演繹方式、表現特色；以〈同谷七歌〉、〈曲江三章章五句〉七古形式而言，盧氏即挖掘了「大義微言，……有補於國史，……詩史」，「真氣激出，……可以怨」，「撫時感事，悽惋傷心，……用意深婉，細味始出」多組詩學議題；更提出「光景至今令人迴環」、「懊悔決絕，甚於怒罵」、「退藏於密意味彌長」、「想見古人閎厚」、「愈率愈婉」等攸關創作之論點。乍觀似不脫傳統詩教說籠囿，但實際上呼應老杜「忠厚」之心，迴翔「風騷」雋永的情感要求，故每觸及「悲」、「怨」描述分析，嘗伴隨不斷調整和「雅」之間距離的自覺，也就難免推卻、擺落直捷式「嘆嗟」篇章，生怕誤導讀者，斲害杜詩整體評

<sup>155</sup> 〔清〕盧世淮，《讀杜私言》，見王學泰編纂，《盧世淮詩話》，收入吳文治主編，《明詩話全編》，冊9，頁9100。

<sup>156</sup> 〔清〕盧世淮，《讀杜私言》，見王學泰編纂，《盧世淮詩話》，收入吳文治主編，《明詩話全編》，冊9，頁9109。

<sup>157</sup> 沈時蓉、庾光蓉，〈盧世淮《讀杜私言》發微〉，《杜甫研究學刊》2000年第4期，頁70-71；王新芳、孫微，〈盧世淮《杜詩笺》及《讀杜私言》考論〉，《新世紀圖書館》2011年第6期，頁71。

價。<sup>158</sup>

究前賢「嘆老嗟卑」質疑，據朱熹（1130-1200）「顧其卒章，歎老嗟卑，則志亦陋矣」<sup>159</sup>說而來。觀以「志陋」為準的，似挑戰老杜「發言為詩」正當性和藝術高度；然察「卒章」內容，「嘆老嗟卑」無甚特出；與〈曲江三章章五句〉相較，亦未必嫌文字淺率；豈朱熹針對「富貴應須致身早」<sup>160</sup>鬆動了部分理想人格、高遠懷抱之堅持而發耶？倘德水批評誠同朱氏論調，牽涉問題仍多，蓋《讀杜私言》非鎖定「卒章」，<sup>161</sup>盧氏更不全反對直露；<sup>162</sup>那麼，執意芟除的理由為何？

從情感面上點檢，〈曲江三章章五句〉固不乏「嘆老嗟卑」，惟二章言：「長歌激越」、「甘作心似灰」，卒章曰：「幸有桑麻田」、「移住南山邊」，逕擺落「垂二毛」遲暮傷懷，無視「比屋豪華」誘引，轉向「富貴之無心」、「生計之可樂」描述，語曠情激。<sup>163</sup>如此，確或與朱熹品評人格、性情高下來脈處，遙相應和。再由形式上判斷，〈曲江三章章五句〉命題作意，仇兆鰲嘗評：「學三百篇，遺貌而傳神者也」，若可補《讀杜私言》「又續國風」之意含，但仇氏同時謂：「〈七歌〉學

<sup>158</sup> 以上引文，見〔清〕盧世淮，《讀杜私言》，見王學泰編纂，《盧世淮詩話》，收入吳文治主編，《明詩話全編》，冊9，頁9104、9108-9111。

<sup>159</sup> 〔宋〕朱熹撰，徐德明等校點，〈跋杜工部同谷七歌〉，《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收入朱傑人等主編，《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冊24，卷84，頁3952。

<sup>160</sup> 〔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杜詩詳注》，冊1，卷8，頁699。

<sup>161</sup> 刪去者非卒章，見「論謫錄」條。〔清〕盧世淮，《讀杜私言》，見王學泰編纂，《盧世淮詩話》，收入吳文治主編，《明詩話全編》，冊9，頁9131。

<sup>162</sup> 如評〈鄭十八虔貶臺州司戶〉：「詩到真處，不嫌其直，不妨於盡。」見〔清〕盧世淮，《讀杜私言》，見王學泰編纂，《盧世淮詩話》，收入吳文治主編，《明詩話全編》，冊9，頁9117。

<sup>163</sup> 以上引文，分見〔唐〕杜甫著，〔宋〕趙次公注，林繼中輯校，〈曲江三章章五句〉，《杜詩趙次公先後解輯校》，冊上，甲帙卷4，頁120-121；〔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曲江三章章五句〉，《杜詩詳注》，冊1，卷2，頁137-139。

《離騷》，仍將二連章分屬《詩經》、《離騷》而立說。<sup>164</sup>

回到〈同谷七歌〉；《讀杜私言》遍論諸體後，設「摘錄」一卷，專拔取「自當孤行宇宙」之一句、數句，謂「靈光秀彩」，「子美之精神在焉」；此舉近乎割裂，惟盧氏自信「小子行之則為忠臣」，不負「越千百年而與子美炳然相見」。即本卷觀之，摘〈同谷七歌〉其一、其七諸句，所謂「老卑」、「卒章」者，莫不在網羅之列；<sup>165</sup> 職此，據「卒章顯志」交鋒，未必合盧氏本衷。

依德水自述，「摘錄」係掇「關涉之大，立教之切」者「略陳梗槩」。抽繹條理，從「開天御世大機括」談起，一闡明杜詩「意警詞微」、「髣髴《春秋》」、「鏤金著誠」；又敘陰陽變狀、性情喜怒，難逃詩人老眼；進言會「全局」、識「堂構」之文章讀法。一描繪子美，與人交，「好心真色為之根柢」，處世間，覺「靜中受用」；謂其人「空融蕩漾，似任似謙」，「洗心滌髓」、「豁然大悟」。總以老杜「真氣」淋漓，莫可名狀，其詩固「天壤精氣」之精也作結。<sup>166</sup> 玩全篇，本於諸「老句苦語」，然立意宗旨明確，與〈大凡〉中觀點尤參錯應和，顯係作者用心結撰之大文章；該〈同谷七歌〉零拾，闡入「子美感慨平生，自序自傷，自負自訟，沉著痛快，如清曉歌哭，令人特地徬徨」與「聲中有淚，淚下無聲，悽惋傷心，仰天太息」一節內，<sup>167</sup> 特突出其含蓄婉轉、令人低迴不已的情感內涵和展露方式，此段所拈數則詩句，其表現手法，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怨而不怒，於風騷實不遠矣！

<sup>164</sup> 以上引文，見〔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曲江三章章五句〉，《杜詩詳注》，冊1，卷2，頁139。參黃奕珍，《杜甫自秦入蜀詩歌析評》（臺北：里仁書局，2005年），頁164-173。

<sup>165</sup> 以上引文，見〔清〕盧世淮，《讀杜私言》，見王學泰編纂，《盧世淮詩話》，收入吳文治主編，《明詩話全編》，冊9，頁9101、9127、9131。

<sup>166</sup> 以上引文，見〔清〕盧世淮，《讀杜私言》，見王學泰編纂，《盧世淮詩話》，收入吳文治主編，《明詩話全編》，冊9，頁9127-9132。

<sup>167</sup> 以上引文，見〔清〕盧世淮，《讀杜私言》，見王學泰編纂，《盧世淮詩話》，收入吳文治主編，《明詩話全編》，冊9，頁9101、9131。

因知，做為〈同谷七歌〉讀者，盧氏必察覺或張揚、躁動，或僥倖、過激令人隱隱不安之氛圍。近人黃奕珍究〈同谷七歌〉「意義結構」及為「創體」之因，肯定其傑出成就，但也留意該「朽敗、無力與荒涼之感」、「形形色色、深淺不一的負面情緒」，警覺杜甫安放自己位置的疑懼不定，感受沈重無望的孤獨無援。<sup>168</sup> 簡錦松讀本詩，亦見情理未愜處，由杜甫動身前官俸、田產和預備川資能力，同谷縣實際山川及城邑景觀，韋氏妹（?-?）居「唐九江郡（江州）」與「鍾離」地理、典故使用落差，併老杜西征之步趾遊蹤、卜宅意願、理生手段各方面參照分析；質難出於拼湊造假。<sup>169</sup> 確衝擊五代、北宋後對本詩的褒貶、認識基礎，使萌生其尋摭「杜詩內證」而脫胎打造之懷疑。

前述簡文，秉現地研究方法、科學求真精神解剖〈同谷七歌〉，或招來悖離文學研究之譏，但實際上，該提問卻源於讀詩者敏銳直覺，加之闇誦杜集、爛熟杜注後的浸潤涵養，最終劃出釐清真偽的底線。如是，讀杜四十餘過之盧世淮，緣何於某次酣暢痛快而徹悟子美情志的閱讀經驗，突破森嚴「箋傳」防線，反覩見文字後與老杜精神扞格的莫名微光？《讀杜私言》中仍透露些許訊息。

究〈大凡〉單論杜詩者，首以〈八哀·故右僕射相國張公九齡〉為例，謂最得詩中關紐，概云：「今之詩不及古之詩，只為費辭說無餘地耳。」次及〈寄常徵君〉，由徵君、海鶴境遇提寫「最是志士傷心處」、「此等艱辛向誰人語？」故言：「全是子美自告自訴，併以憐及徵君。想寄詩時，不知淚下幾行？乃忠厚之至也。」在有限評述中，儼似攤開對杜詩文字、情意之審美企想的藍圖，蓋即便世路崎嶇，人事磨難恆酸辛，仍要寬宏以對，秉心、發語皆溫厚親和；文字尤須蘊

<sup>168</sup> 以上引文，見黃奕珍，《杜甫自秦入蜀詩歌析評》，頁 154-155、157、159-164。

<sup>169</sup> 簡錦松，〈杜甫同谷詩現地研究〉，《臺大文史哲學報》第 84 期（2016 年 5 月），頁 75-87。

藉清省，優遊容與，寬綽有餘地。當此雙重堅持把關，〈同谷七歌〉摹寫子美形象與〈大凡〉剖露老杜性情、肝腸之錯位、失焦，始被放大檢視，而此，亦德水獨舉二詩例，謂「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全部杜詩，迎刃而解」<sup>170</sup> 的原因。

## （二）杜詩學意義的「錢王代興」

延續上節，盧氏評〈同谷七歌〉劣於「風騷」之由，殆與「忠厚惻怛」的密度相關；惟其測量標準，仍受時代因素左右。

如前述，晚明新興「尚簡要」杜詩箋釋風氣，乃文學內部發動，積極推波促成，屬其一。至若身當末季，見大道荊棘、流俗沉溺，誓以杜公裴回「師友君臣之際」人品高度、古道熱腸，及「大義微言，卓乎有補於國史」、「可以怨」之渾融詩、史的春秋老筆、風騷遺韻，<sup>171</sup> 導出詩人怵惕惻隱、仁厚深心，似將救濟人病，裨補時闕者，屬其二。

盧氏「却掃」<sup>172</sup> 期間撰作，以宏大敘述為目標，蓋世運使之然。就茲而言，和《錢注》出發點相近，惟牧齋提煉杜詩精髓後，有更切身之要務，於「注本」內嵌入安頓新吾身分、容載牧野鷹揚想像、翻轉青史評價的隱形冀求；成就另一部紙背下的嘔心鉅著。此猶牧齋為自我奮戰之孤注一擲，故絕然以「行動者」<sup>173</sup> 之姿向前邁進。

<sup>170</sup> 以上引文，見〔清〕盧世淮，《讀杜私言》，見王學泰編纂，《盧世淮詩話》，收入吳文治主編，《明詩話全編》，冊9，頁9100。

<sup>171</sup> 以上引文，見〔清〕盧世淮，《讀杜私言》，見王學泰編纂，《盧世淮詩話》，收入吳文治主編，《明詩話全編》，冊9，頁9103、9108。

<sup>172</sup> 〔清〕盧世淮，《讀杜私言》，見王學泰編纂，《盧世淮詩話》，收入吳文治主編，《明詩話全編》，冊9，頁9099。

<sup>173</sup> 倪孟安、黃咨玄、劉威志整理報導，〈學人專訪：嚴志雄教授〉，收入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編，《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面面觀》第1輯（臺北：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推動委員

「前惟山谷後錢盧」之意義，便在此初步發生；德水、牧齋先後研治杜詩，激盪之火花，亦在此相即交融。追溯源頭，該向變動、歷史的「箋傳」敘事求取對話，熱切與時代周旋，推闡屬於當下杜詩解釋內涵的取徑，乃由本文發掘之山谷、遺山一脈相承的杜詩學系譜導夫先路，而錢、盧又在此基礎增益附麗，各發展為獨特的箋注模式，不僅回應、紓解了擾攘之社會氛圍，也滿足注者私心的期望。

當為錢、盧因緣尋得明末清初背景之深層鏈結，建立學理上紐帶後，研究者易將目光投注錢氏杜詩學中寢受討論之「明遺民性詩學」話語系統，追問二氏具體交流情況；然泥定於此，無法逼現其時杜詩學特殊風貌，抽繹錯綜文理之形成條件和潛含規律。要之，開創新局人物，殆為王士禛，其目光獨到，將戰略位址移向「明清之際」文學場域，藉同時拉抬「錢、盧」地位，賦予了易代時空色彩，從而，推動杜詩學意義的「錢王代興」。

王氏於順、康詩壇，實力茁壯，隨「江左三大家」、「遺民詩群」<sup>174</sup> 輩漸次凋零，其位望愈發穩固；箇中因素，除時勢造英雄使然外，無乃個人透過文學圈活動（如飲宴、唱和）積極運作而促成。回到漁洋追逐自我詩壇定位初期，最為津津樂道的，蓋〔清〕順治十四年（1657）八月賦〈秋柳詩四首〉後掀起之一波「創作及再創作的熱鬧活動」，<sup>175</sup> 此固漁洋啟動、策劃，但該流傳及影響，則溢出當代、跨越時空，早非始作俑者所能逆料；如是觀之，其透過描述「後山谷時期」箋傳典範，殆可視為階登壇坫之信念、行動的另一面宣告，也似正遙遙吐訴不忘故園平蕪的身分語調，盼傳眇同聲。尤其，徵和〈秋

---

會，2011年），頁55-56。

<sup>174</sup> 嚴迪昌，《清詩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冊上，頁61-66；趙永紀，《清初詩歌》（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93年），頁14、142。

<sup>175</sup> 柳作梅，〈漁洋山人秋柳詩法疑〉，《圖書館學報》第10期（1969年12月），頁211-232；嚴志雄，《秋柳的世界：王士禛與清初詩壇側議》，頁3。

柳詩〉過程，漁洋曾致函牧齋，乞望俯允寄贈。<sup>176</sup>

漁洋〈戲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三十二首〉其五即真切展示行動的內涵。詩作於順治十八年（1661）去信牧翁後（按，康熙二年，1663），時維二人初相交，尺牘往來、詩作酬答漸頻數，牧齋讀其順治丙申、丁酉年（1656、1657）佳什（當以〈秋柳詩〉壓卷），寄予厚望，勗勉力挽頹波，尤贈「貽上代興」諸語，不啻強調二人世代交替意義。<sup>177</sup>此間文字涉杜詩者，見牧齋覆信，蓋亟言「注杜之難」，<sup>178</sup>與〈草堂詩箋元本序〉之意若同，知為老人習常論調；又或與時正介乎「長孺請序」、「二注別行」兩事發生區間有關。<sup>179</sup>按諸錢書，乃因漁洋詢問而禮貌作答，亦可見，當〈戲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三十二首〉前，王氏已關心並肯定牧齋《讀杜小箋》、《讀杜二箋》的成就。

至於盧德水入列，其內情，須回溯王氏〈戲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三十二首〉其五寫作出發點而測度。此刻，《石洲詩話》尖銳批評當再被提起，「漁洋傳會其鄉人之詞，不可為據也。」<sup>180</sup>翁氏誠一語中的，漁洋放眼當世注家，德水近在咫尺，光采奪目，安舍之耶？惜翁氏亦僅知其一，莫辨弦外之音，倘王詩因鄉誼定奪，其潛含目的，恐在向遺民性光譜一端發聲，引讀者於注目頂禮其人「箋傳」成就時，亦駐足流連明清之際諸多事件場景。而此溝通兩方橋樑，即錢、盧二人無畏無懼、肝膽相照之易代前、後交誼。

<sup>176</sup> 見〔清〕錢謙益，〈與王貽上〉，《錢牧齋先生尺牘》，《牧齋雜著》，收入〔清〕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錢牧齋全集》，冊7，卷1，頁223-227。參孫之梅，《錢謙益與明末清初文學》（濟南：齊魯書社，1996年），頁385-397；蔣寅，《王漁洋與康熙詩壇》，頁4。

<sup>177</sup> 蔣寅，《王漁洋與康熙詩壇》，頁2-6；李孝悌，〈士大夫的逸樂：王士禛在揚州（1660-1665）〉，《昨日到城市：近世中國的逸樂與宗教》（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8年），頁186。

<sup>178</sup> 〔清〕錢謙益，〈與王貽上〉，《錢牧齋先生尺牘》，《牧齋雜著》，收入〔清〕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錢牧齋全集》，冊7，卷1，頁224。

<sup>179</sup> 莫礪鋒，〈朱鶴齡杜詩輯注平議〉，《古典詩學的文化觀照》，頁244。

<sup>180</sup> 〔清〕翁方綱著，陳邇冬校點，《石洲詩話》，卷8，頁241。

王士禛在板蕩時局裏陶鈞文思、醞釀美學品味，詩學觀必浮動、且不斷吐納新時代的思維；與牧齋短暫過從四年，其外在環境之文學、文化思潮，與內在個人身心性命、價值依趨等，皆面臨斷裂、重組、再造之衝擊，清初詩壇從漫天落花／易代傷懷中走來，正欲滌除故陰，展露新朝氣象，應運而生的下一輪世代詩人，將破繭而出，大顯身手；漁洋際會其間，則要以「前惟山谷後錢盧」做為焦慮不已的「新吾」身分確立之場所，<sup>181</sup> 於杜詩學鉤沉歷史脈絡、回應現實精神，及凸顯當代關懷、撫慰心靈世界諸面向，均極力籠括。此意欲作法，與認〈秋柳詩〉相對「明遺民性詩學」「毋寧是一種『挪用』與『變調』」之觀點，具辯證關係，值得深入玩索。<sup>182</sup> 由「明清之際」視域下檢驗，漁洋之「新吾」挺立，與牧齋催生「新吾」歷程，又是該時空勝朝人物身蹈王土／異域、浮游失根的必然試煉和重複戲碼。

漁洋淘洗被吹逐的夢華記憶，卻也構築召喚前身、締聽回聲的戰壘；其擷取錢、盧易代間醒目斷片，適為自身「行動者」之意圖加分。基於此，吾人可視凝定於《讀杜小箋》、《讀杜二箋》論詩意見為「明清之際」杜詩學內涵轉變的一個側面，和創造性節點；<sup>183</sup> 稍晚修訂之《錢注》，則彌補原論述中未能預見之留白，綿延、完整了王詩觀照的幅度，由是，成該階段性杜詩解釋史任務的最佳見證。

## 五、結語

錢牧齋以一詩一序，表露傳薪、交棒意味，引為詩界美譚，亦牽

<sup>181</sup> 王士禛致力追求的「新吾」身分，或可謂：「導致了明遺民性詩學的鬆動與『貶值』。」見嚴志雄，《秋柳的世界：王士禛與清初詩壇側議》，頁 12。

<sup>182</sup> 非本文討論主軸，茲不贅言。參見嚴志雄，《秋柳的世界：王士禛與清初詩壇側議》，頁 12、17-71。

<sup>183</sup> 漁洋立基於「神韻」主張、「辨體」意識，對杜詩亦不乏指瑕、批評，參徐國能，〈王士禛杜詩批評析辨〉，《漢學研究》第 24 卷第 1 期（2006 年 6 月），頁 331-343。

動詩歌史對「錢王代興」諸多討論。<sup>184</sup> 當此為人熟悉的忘年交游和詩學關係外，卻另有一低調的錢、王對話情境悄悄展開，透過〈戲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三十二首〉其五在遺民日常中盪漾餘波。

吾人將如何揣度漁洋信步新、舊兩朝間心思？或推察「前惟山谷後錢廬」之「遺民性詩學」的話語意圖呢？

當收到牧齋書、序及贈詩，漁洋亦作〈蓉江寄牧翁先生〉報謝，云：

芙蓉江上雨廉纖，東望心知拂水巖。共識文章千古事，直教仙佛一身兼。夜聞寒雪推篷笠，春惜濃花側帽簷。兩到江南不相見，少微空向老人占。<sup>185</sup>

頷聯可謂：「漁洋作為詩壇盟主的繼位者，給牧齋以身後的承諾和安慰。」<sup>186</sup> 頸聯則針對牧齋入清後改投「復明」陣營之心跡、行事而暗中迴護，流露嘆息，顯於此關節向牧齋輸誠，抑與是輩人物交心、表態；該二句，因層層轉喻，「推篷笠」、「側帽簷」遂隱指繫念故國之間道伴侶，其本事，同出牧齋〈書夏五集後示河東君〉：詩居《有學集》卷三《庚寅夏五集》末，蓋順治七年（1650）訪馬進寶於婺州，歷險得返，疑信間寫與柳如是之作，具總結此行成效的意義。若更回顧斯《有學集》併《秋槐詩集》、《秋槐詩支集》當牧翁人生幾歷摧折後所起關鍵性作用，寔知：漁洋亦頻眷視牧齋之襟期友、明眼人也！其寄詩所採取的，即是明遺民性詩學之話語手法。

本諸由殷頑耆舊立場捍衛牧齋之心思取向，漁洋除將「文章千古

<sup>184</sup> 參見〔清〕錢謙益，〈王貽上詩序〉，《有學集》，收入〔清〕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錢牧齋全集》，冊5，卷17，頁765-766；〈古詩贈新城王貽上〉，《有學集》，冊5，卷11，頁543-547。

<sup>185</sup> 〔清〕王士禛著，李毓芙、牟通、李茂肅整理，〈蓉江寄牧翁先生〉，《漁洋精華錄集釋》，冊上，卷2，頁310。

<sup>186</sup> 蔣寅，《王漁洋與康熙詩壇》，頁7。

事」<sup>187</sup> 成就納入遺民境遇理解外，其論注杜之「前惟山谷後錢盧」評判，亦斷難和此機心、目的脫勾。於是，本文從「明清之際」同情共感，窺入杜詩學回應歷史處境而蜿蜒發展的微徑，透過「錢、王」客觀承繼事實，發掘王氏受「代興」期許鼓蕩，進揭出「山谷→錢、盧」箋傳系譜之深刻原因，便擁有更精確的論據和清晰的描述方向。其時，紛雜、隱蔽之眾多對杜詩解釋的訊息，在此視線下，彙集為劫餘後重抖擻精神的時代嘯嗟，亦烘托出杜詩學堅毅、性格分明之「江河萬古流」<sup>188</sup> 中的一個側影。

經對「前惟山谷後錢盧」論述淵源之闡發，茲歸納小結如下：

1、本文最初提問，是因王漁洋〈戲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三十二首〉其五而引起，先要回答的有（1）山谷與錢、盧為何入選？（2）山谷與錢、盧間的關係為何？（3）山谷與錢、盧聯繫後，其杜詩學意義為何？職此，筆者認為，須突出元好問的杜詩學觀點為中介，據其軌範「大雅」、椎心「喪亂」而觸發之「詩史」意識、開拓之箋杜情志空間，始能通貫「山谷」、「錢、盧」，活絡兩端各展現的解釋史特徵和內在振盪，<sup>189</sup> 有助交融為一嶄新的、蘊含「明清之際」生命力的創造性視野。就具體研究內容言，將得描述「無意於文」到「哀時託興」兩種杜詩解釋途徑，及其視角轉換的軌跡；是兼有杜詩學和清代詩學史的研究價值。

2、本文回到「明清之際」語境下探訪，過程中，依託錢、王同遭鼎革，及漁洋繼牧齋主盟詩壇之「世代交替」意義為取徑和觀察角度。錢、盧相繼注杜，其成果，體現二人正視時代遽變、回應自身處境的先識、態度和格局，誠具引為新典範的積極條件；準此，漁洋之洞見無庸置疑，但實際上，其注目且不忘提醒讀者的，卻是錢、盧闖入世

<sup>187</sup> 〔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偶題〉，《杜詩詳注》，冊3，卷18，頁1541。

<sup>188</sup> 〔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戲為六絕句〉，《杜詩詳注》，冊2，卷11，頁899。

<sup>189</sup> 參謝思焯，〈杜詩解釋史概述〉，《唐宋詩學論集》，頁79-97。

變而未嘗動搖的一段死生交誼。有關二人過往之原委，論者雖廣泛知悉，然乏深入研治；今本文藉茲補充漁洋「論詩」所夾帶的另類訴求，不僅為原詩添染濃厚「遺民性」色彩，亦可由是推測，此舉殆頗工心計，兼有文學、政治雙重目的之狡獪設計，替漁洋爭取到更廣大的讀者認同。「錢、盧」之意義，極可能基於此一情感傾向而定調，遂擄獲、撫慰易代間無數黯然神傷的垂老心靈。同時，這也意味著，漁洋認為「錢、盧」理應如此被看見。值得深思的是，倘依本文所汲取「錢王代興」時代因素和接班期望之理解，錢、王於杜詩詮釋的靈犀一點、欣然無間，與二氏建立在「書、詩、序」往還的密切關係，何嘗不也尋求同一份被望見的悸動？被看穿的釋然？或猶兀自呼喚時間廊道上的來者，乞報以一聲悠緩的長歎？

3、漁洋所關注「山谷」到「錢、盧」之發展，其各自「箋傳」立場、內容上之微妙聯繫，即透過「忠厚惻怛」做為承啟的樞紐。四字評論老杜，見諸盧氏《讀杜私言》，但該解釋的脈絡源遠流長，內涵亦不斷遞嬗修正。<sup>190</sup> 要之，山谷〈大雅堂記〉針貶時弊，提出系統化論述，示後學以含咀、體貼之軌轍，轉由神理上捕捉老杜，是改絃更張之始，功不可沒；遺山〈杜詩學引〉將「風騷」本旨釋放至社會現實和歷史脈動，觸及「詩史」幽窈本質，則予當過渡、轉型的「明清之際」注家，浥注了活潑生命力、縱浪時代變遷的性格特徵。德水論杜，即因不愜傳統「忠厚惻怛」之判定和「風騷之極」的表現方式，故另尋一批判、動人的審美價值，遂在面向「世變」積極態度上，與牧齋打造「今吾」的行動意識自然契合；惟該觸類引申之「闡幽發

<sup>190</sup> 自中、晚唐樊晃（?-?）《杜工部小集》、孟啟（?-?）《本事詩》提出評價，逮仇兆鰲、楊倫（1747-1803），仍秉「溫柔敦厚」、「愛國忠君」、「忠誠出於天性」、「變雅變風」、「繼跡風雅」說杜。以上論述，分見〔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凡例〉，《杜詩詳注》，冊1，頁21-26；〈附進書表〉，冊3，頁2351-2352；〔唐〕杜甫著，〔清〕楊倫箋注，〈凡例〉，《杜詩鏡銓》（臺北：華正書局，2003年），冊上，頁13-14。樊晃弘揚杜甫的卓識，參陳尚君，《行走大唐》（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17年），頁75-76。

微」，<sup>191</sup> 洎牧齋又有所調整，《錢注》意在繁瑣箋注條目中傾寫坎壈之鳴，訴說幾墮為亂臣賊子身分標籤之懺悔、自贖，尤艱難地填補首鼠兩朝者失語的仁愛忠愍。於是，牧齋循箋注草木蟲魚方式，以遺民性詩學話語／情志批評手法展開杜詩箋傳的當代意義。

綜合以上三點，昔往積澱的精光，終至漁洋手裏，始串連成一道延續性的風景；此蓋漁洋回顧不同階段解釋史任務後提出的新命題，亦展現其巢於世變、游於鼎沸中的深切自覺。必須補充的是，無論出於個人私心冀盼，抑或盱衡杜詩學全局的宏偉企圖，皆無法迴避視線中《錢注》的要衝地位，故「前惟山谷後錢盧」雖成句在先，但就後續影響層面，兼及杜詩學論述之完整、完成而言，勢要以《錢注》為研究核心標的。如此，方能真正映現「明清之際」視域下杜詩學的風貌和鎔冶開新的時代精神。

（責任校對：林琬紫）

---

<sup>191</sup> 綦維以茲成績，堪與王嗣爽（1566-1648）《杜臆》媲美。綦維，〈德州學者盧世淮的杜詩學成就〉，頁 152。

## 引用書目

### 一、傳統文獻

- 〔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臺北：藝文印書館，2012年。
- 〔唐〕白居易著，謝思煒撰，《白居易詩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 〔唐〕杜甫著，〔宋〕趙次公注，林繼中輯校，《杜詩趙次公先後解輯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 〔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臺北：里仁書局，1980年。
- 〔唐〕杜甫著，〔清〕朱鶴齡輯注，韓成武等點校，《杜工部詩集輯注》，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9年。
- 〔唐〕杜甫著，〔清〕楊倫箋注，《杜詩鏡銓》，臺北：華正書局，2003年。
- 〔唐〕杜甫著，〔清〕錢謙益箋注，《錢注杜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 〔唐〕杜甫撰，〔宋〕黃庭堅箋，《杜詩箋一卷》，收入周采泉編，《杜集書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 〔唐〕杜甫撰，〔宋〕蔡夢弼注，《杜工部草堂詩箋》，《續修四庫全書》，冊130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據清光緒黎庶昌刻《古逸叢書》本影印。
- 〔唐〕杜甫撰，〔清〕盧世淮選述，《杜詩胥鈔》，劍橋：哈佛燕京圖書館，2007年，據明崇禎七年（1634）盧氏尊水園刊本縮製微捲。
- 〔唐〕李商隱著，劉學鍇、余恕誠集解，《李商隱詩集解》，臺北：洪業文化事業公司，1992年。
- 〔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 〔宋〕朱熹撰，徐德明等校點，《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收入朱傑人

- 等主編，《朱子全書》，冊 2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 〔宋〕宋敏求編，李希泌主編，毛華軒等編，《唐大詔令集補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
- 〔宋〕黃庭堅，《杜詩箋》，收入〔元〕陶宗儀編，《說郛》，《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880，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
- 〔宋〕黃庭堅著，鄭永曉整理，《黃庭堅全集輯校編年》，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 年。
- 〔宋〕黃震，《黃氏日鈔》，收入張偉、何忠禮主編，《黃震全集》，冊 6，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3 年。
-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
- 〔金〕元好問著，狄寶心校注，《元好問詩編年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1 年。
- \_\_\_\_\_，《元好問文編年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2 年。
- 〔金〕元好問著，姚奠中主編，《元好問全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年。
- 〔清〕王士禛著，李毓芙、牟通、李茂肅整理，《漁洋精華錄集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
- 〔清〕永瑆等，《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65 年。
- 〔清〕田雯，《古歡堂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13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據清康熙乾隆間刻德州田氏叢書本影印。
- 〔清〕翁方綱著，陳邇冬校點，《石洲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 年。
- 〔清〕徐燾，《小腆紀傳》，北京：中華書局，1958 年。
- 〔清〕張廷玉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
- 〔清〕陳衍撰，王培軍校點，《石遺室詩話續編》，收入張寅彭主編，《民國詩話叢編》，冊 1，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 年。

- 〔清〕盧世淮，《讀杜私言》，《尊水園集畧》，《續修四庫全書》，冊139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據清順治刻十七年（1660）盧孝餘增修本影印。
- 〔清〕盧世淮，《讀杜私言》，見王學泰編纂，《盧世淮詩話》，收入吳文治主編，《明詩話全編》，冊9，南京：鳳凰出版社，1997年。
- 〔清〕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 〔清〕錢謙益著，〔清〕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錢牧齋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 二、近人論著

- 方良，《錢謙益年譜》，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13年。
- 王新芳、孫微，〈盧世淮《杜詩笥鈔》及《讀杜私言》考論〉，《新世紀圖書館》2011年第6期，頁70-73、16。
- 朱東潤著，陳尚君整理，《元好問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
- 何繼文，〈翁方綱對黃庭堅詩的評價〉，《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2012年第54期，頁231-254。
- 吳在慶、曾曉云，〈嚴武再帥劍南抑或三鎮蜀川考〉，《周口師範學院學報》2007年第1期，頁28-30。
- 李正民，〈元好問詩論初探〉，《西南師範學院學報》1981年第4期，頁70-82。
- 李孝悌，〈士大夫的逸樂：王士禛在揚州（1660-1665）〉，《昨日到城市：近世中國的逸樂與宗教》，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8年，頁159-200。
- 李欣錫，《錢謙益明亡以後詩歌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8年。
- \_\_\_\_\_，〈錢牧齋〈讀梅村宮詹豔詩有感書後四首〉析論〉，《清華中

文學報》第3期，2009年9月，頁1-42。

\_\_\_\_\_，〈春光中遣動的「秋興」——論錢遵王《判春集》及對錢牧齋「詩史」觀之實踐〉，收入李貞慧主編，《中國敘事學：歷史敘事詩文》，新竹：清華大學出版社，2016年，頁263-325。

李建福，〈漁洋論詩絕句證析（一）〉，《文史學報》第17期，1987年3月，頁7-52。

\_\_\_\_\_，〈漁洋論詩絕句證析（二）〉，《文史學報》第18期，1988年3月，頁23-32。

\_\_\_\_\_，〈再論漁洋〈論詩絕句〉「苦為《南華》求向郭，前惟山谷後錢盧」——兼答簡恩定先生〉，《文史學報》第19期，1989年3月，頁73-92。

沈時蓉、庾光蓉，〈盧世淮《讀杜私言》發微〉，《杜甫研究學刊》2000年第4期，頁65-72。

周益忠，《論詩絕句》，臺北：金楓出版社，1999年。

周勛初，《高適年譜》，《周勛初文集》，冊4，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

林繼中，〈杜詩〈洗兵馬〉錢注發微〉，《中華文史論叢》2011年第3期，頁335-368、396。

\_\_\_\_\_，《杜詩學論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柳作梅，〈朱鶴齡與錢謙益之交誼及注杜之爭〉，《東海學報》第10卷第1期，1969年1月，頁47-58。

\_\_\_\_\_，〈漁洋山人秋柳詩祛疑〉，《圖書館學報》第10期，1969年12月，頁211-232。

洪業著，曾祥波譯，〈杜詩引得序〉，《杜甫：中國最偉大的詩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頁255-344。

胡曉明，〈陳寅恪與錢鍾書：一個隱含的詩學範式之爭〉，《詩與文化心靈》，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頁245-256。

- 倪孟安、黃咨玄、劉威志整理報導，〈學人專訪：嚴志雄教授〉，收入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編，《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面面觀》第1輯，臺北：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2011年，頁55-64。
- 孫之梅，《錢謙益與明末清初文學》，濟南：齊魯書社，1996年。
- 孫微，《杜詩學文獻研究論稿》，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10年。
- 孫微、王新芳，〈「不箋一字是功臣」——論明清杜詩學中的一種極端傾向〉，《中國韻文學刊》2007年第4期，頁27-30、44。
- \_\_\_\_\_，〈吳若本《杜工部集》研究〉，《圖書情報知識》2010年第3期，頁32-40。
- 徐國能，〈王士禛杜詩批評析辨〉，《漢學研究》第24卷第1期，2006年6月，頁323-353。
- \_\_\_\_\_，〈元好問杜詩學探析〉，《清華中文學報》第7期，2012年6月，頁189-234。
- 郝潤華，《《錢注杜詩》與詩史互證方法》，合肥：黃山書社，2000年。
- 郝潤華等，《杜詩學與杜詩文獻》，成都：巴蜀書社，2010年。
- 張伯偉，〈清代論詩詩的新貌〉，《江蘇社會科學》2002年第3期，頁128-134。
- \_\_\_\_\_，〈杜詩研究與當代學術〉，《江淮論壇》2012年第6期，頁148-151。
- 張忠綱等編著，《杜集敘錄》，濟南：齊魯書社，2008年。
- 張健，《王士禛論詩絕句三十二首箋證》，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
- 曹樹銘，〈《杜詩箋》增校〉，《杜集叢校》，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78年，頁21-104。
- 莫道才，〈黃庭堅論杜甫〉，《杜甫研究學刊》1997年第2期，頁53-61。

- 莫礪鋒，〈論黃庭堅詩歌創作的三個階段〉，《文學遺產》1995年第3期，頁70-79。
- \_\_\_\_\_，〈評林繼中的《杜詩趙次公先後解輯校》〉，《唐宋詩論稿》，瀋陽：遼海出版社，2001年，頁150-157。
- \_\_\_\_\_，〈朱鶴齡杜詩輯注平議〉，《古典詩學的文化觀照》，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頁242-279。
- \_\_\_\_\_，〈論蘇黃對唐詩的態度〉，《唐宋詩歌論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年，頁379-395。
- 許總，《杜詩學發微》，南京：南京出版社，1989年。
- 陳尚君，〈喜讀《杜詩趙次公先後解輯校》〉，《杜甫研究學刊》1996年第2期，頁68-73。
- \_\_\_\_\_，〈杜詩早期流傳考〉，《敬畏傳統》，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46-67。
- \_\_\_\_\_，《行走大唐》，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17年。
- 陳寅恪，《柳如是別傳》，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
- 陳樂保，《唐代劍南道研究——以政治地理與戍防體系為中心》，濟南：山東大學中國古代史專業博士論文，2015年。
- 陶子珍，〈金代詞選——元好問《中州樂府》析論〉，《彰化師大國文學誌》第12期，2006年6月，頁255-281。
- 程千帆，〈對於金代作家元好問的一、二理解〉，《文史哲》1957年第6期，頁3248-3252。
- \_\_\_\_\_，〈杜詩偽書考〉，《古詩考索·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323-341。
- 黃奕珍，《杜甫自秦入蜀詩歌析評》，臺北：里仁書局，2005年。
- 詹杭倫、沈時蓉，《杜詩學管窺》，臺中：文听閣圖書公司，2012年。
- 廖仲安，〈讀詩瑣掇·黃節所作盧世淮《讀杜私言》序〉，《反芻集》，北京：北京師範學院出版社，1986年，頁513-514。

- 廖美玉，〈東京與兩川——王安石、黃庭堅學杜的兩種視角〉，收入上海社會科學院《傳統中國研究集刊》編輯委員會編，《傳統中國研究集刊》第6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頁203-222。
- \_\_\_\_\_，〈錢牧齋論學杜在建構詩學譜系上的意義〉，《文與哲》第15期，2009年12月，頁285-332。
- 裴維，〈德州學者盧世淮的杜詩學成就〉，《東岳論叢》2004年第4期，頁149-153。
- 裴世俊，〈清初錢、王「代興」之說芻議〉，《山東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89年第3期，頁54-60。
- \_\_\_\_\_，〈錢謙益詩歌研究〉，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91年。
- 趙永紀，《清初詩歌》，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93年。
- 趙敏俐、吳思敬主編，韓經太等著，《中國詩歌通史：宋代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年。
- 趙興勤，《元遺山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2011年。
- 歐麗娟，《李商隱詩歌》，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3年。
- 蔡英俊，〈論杜甫戲為六絕句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的意義〉，收入周益忠，《論詩絕句》，臺北：金楓出版社，1999年，頁197-244。
- \_\_\_\_\_，〈「詩史」概念再界定——兼論中國古典詩中「敘事」的問題〉，收入蔡英俊等，《臺灣學術新視野：中國文學之部（一）》，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7年，頁1-21。
- \_\_\_\_\_，〈詩歌與歷史：論詩史的歷史成分及其敘述的轉向〉，《清華中文學報》第3期，2009年12月，頁239-272。
- 蔡振念，《杜詩唐宋接受史》，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2年。
- 蔡錦芳，〈吳若本與《錢注杜詩》〉，《杜詩版本及作品研究》，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07年，上編，頁66-74。
- 蔣寅，《王漁洋事跡徵略》，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

- \_\_\_\_\_,《王漁洋與康熙詩壇》，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
- 鄧紹基，〈關於錢箋吳若本杜集〉，《江漢論壇》1982年第6期，頁44-46。
- 鄭永曉，〈關於黃山谷學杜的歷史爭議及重新認識〉，《廣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8期，頁59-64。
- 蕭麗華，《元詩之社會性與藝術性研究》，臺北：國家出版社，1998年。
- 錢鍾書，《管錐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
- 謝思煒，《唐宋詩學論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
- 簡恩定，《清初杜詩學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
- \_\_\_\_\_,〈漁洋論詩絕句「苦為南華尋向郭，前惟山谷後錢盧」正解〉，《文史學報》第18期，1988年3月，頁13-21。
- 簡錦松，〈杜甫〈八哀詩〉新注〉，收入吳宏一教授六秩晉五壽慶暨榮休論文集編輯小組編，《吳宏一教授六秩晉五壽慶暨榮休論文集》，臺北：里仁書局，2008年，頁789-830。
- \_\_\_\_\_,〈杜甫同谷詩現地研究〉，《臺大文史哲學報》第84期，2016年5月，頁53-96。
- 嚴志雄，《錢謙益〈病榻消寒雜詠〉論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2年。
- \_\_\_\_\_,《秋柳的世界：王士禎與清初詩壇側議》，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13年。
- \_\_\_\_\_,〈清初錢謙益王士禎「代興」說再議〉，收入山東省古典文學學會、王漁洋文化研究保護中心編，《紀念王漁洋誕辰380周年全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濟南：齊魯書社，2016年，頁29-47。
- \_\_\_\_\_,《錢謙益的「詩史」理論與實踐》，北京：中華書局，2019年。
- 嚴迪昌，《清詩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
- 龔鵬程，《詩史本色與妙悟》，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2年。
- 〔日〕長谷部剛文，李寅生譯，〈簡論《宋本杜工部集》中的幾個問

「明清之際」視域下杜詩學的一個側影——從「前惟山谷後錢廬」談起 ■

題〉——附關於《錢注杜詩》和吳若本〉，《杜甫研究學刊》1999  
年第4期，頁31-38。

Yim, Lawrence C. H. *The Poet-historian Qian Qianyi*.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 Analyzing Du Fu's Poe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Ming-Qing Transition—Taking Wang Shizhen's "Before Shangu, After Qian-Lu" as a Point of Departure

Hsin-Hsi Lee\*

### Abstract

Wang Shizhen 王士禎 employed the phrase "before Shangu 山谷, after Qian-Lu 錢廬" to describe the tradition of annotation on Du Fu's 杜甫 poetry. In his discussions of Du Fu, Wang attempted to redefine the style of poetic annotation advanced by the Jin and Yuan dynasty literatus Yuan Haowen 元好問. Through an analysis of the perspective on the Ming-Qing transition revealed in Wang Shizhen's poems, it is possible to elucidate Du Fu's poetic significance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This article describes two interpretative approaches to Du Fu's poetry that reveal a shift in perspective from "unintentionally writing prose" to "inspiring emotion by expressing sadness about the times." I begin by providing an account of Yuan Haowen's point of view on Du Fu's poetry. I then proceed to analyze the status and purpose of Lu Shique's 盧世淮 and Qian Qianyi's 錢謙益 notes and commentary on Du Fu during the Ming-Qing transition. Finally, I examine Wang Shizhen's discussions of Du Fu's poetic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to the poetics of Ming loyalism

---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through the generational succession from Qian to Wang.

Thus, this study sheds light on both the poetics of Du Fu and the poetics of the Qing Dynasty.

**Key words:** Ming-Qing transition, the poetics of Du Fu, Qian Qianyi 錢謙益, Lu Shique 盧世澐, Wang Shizhen 王士禛, Yuan Haowen 元好問

